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亨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21 期
2000 年 7 月 15 日

本 期 要 目

【译文选编】

俄罗斯，地区民族主义和联邦政治

格雷姆·史密斯 (Graham Smith) 关 凯 译

熔炉，沙拉碗——还是大蒸锅

Shirin Akiner 著 王 璇 译

【学术动态】

第五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厦门召开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译文选编】

俄罗斯，地区民族主义和联邦政治¹

格雷姆·史密斯 (Graham Smith)

关凯 译

摘要:本文论述了俄国国内的联邦制、转型和地区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前苏联俄罗斯的联邦制，特别指出最初伴随着联邦的建立所产生的问题，联邦的建立基于向民族共和国以及他们的民族自决权理念妥协；第二部分，通过集中讨论联邦与民主、经济关系与联邦财政主义、以及文化控制权力与自治之间的关系，来认清中央与民族共和国间的紧张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可以看到的是这种紧张关系已经助长了地区民族主义，但只限于一个民族共和国要求完全的政治主权——车臣。第三部分通过运用资源动员理论论述了为什么只有车臣提出分裂主义要求。地区政治精英、社区认同和经济多样化在强化分裂主义要求中的作用被特别加以简单论述。文章结论中指出：当民族共和国被发展不足的联邦理念重新塑造了的时候，出于分裂主义原因可以用于调动的选民的的政治资源要比通常假设的有限得多。

关键词：俄罗斯、联邦主义、转型、民族共和国、民族自决、资源动员

联邦制、转型和地区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已经证实正在严峻考验着新俄罗斯，尤其引发了一个问题：接受一种特殊形式的联邦统治是否符合向民主国家建设和市场经济转型的需要，而同时又可以避免国家领土分裂。尤其关键的是出现了由中央规定的联邦化的范围难以与地方国家主义者的民族自决的期望共处的情形，后者宣称他们的地方政体（或民族共和国）归民族独有。这不仅导致了許多民族共和国将其自身利益放在联邦利益之上，而且如在车臣事件中，根本不愿意参与联邦的安排。

一个主权国家声称合法具有联邦身份，并非只凭一个说它构成联邦的声明。不考虑 1993 年 12 月联邦宪法的公布，对俄罗斯是否能够合法地声称是一个建立在民主原则基础上的联邦存在着一些疑点。从一方面说，它包含了许多总的说来与联邦制相配合的特征。首先最明显的优势是表现在领土上。俄罗斯包括 88 个区域，其中 32 个以民族指标为基础，被称作 21 个民族共和国和 11 个自治区，其余基于非民族指标。其次，对领土的代表至少由两个次国家级政府确立：称作“地方的”与“州政府”。第三，地区单位在选举中合并进入全国中央的决策程序。这一点通过在联邦议会上院（联邦议会）和下院（国家杜马）的代表明确。另一方面，1993 年 9 月事变后向总统制的转变和总统业已巩固的对联邦议会和各州、地方政府的增大的权力标志着正在建立的国家集合体，与其说是民主的联邦，不如说是集权的独裁政治。特别是联邦一些由总统掌握的有特色的执行职能，不是由中央里的地区代表通过国家立法机构确立的。此外，合法地描述联邦制，地区自治应受宪法保障；中央不应有废除、改变或重新规定联邦的地区单位的法律权力。由于这些缺陷，精确地说，俄罗斯可以更适宜地被看作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联邦制。

无论如何，问题不仅仅在于俄罗斯的制度结构、程序和协议是否充分证实一种联邦制的民主的身份。如同其他地方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联邦作为可以成功运行的统治的特殊组织形式，要求一套社会所持有的价值和信仰，其前提是理解差异中的统一是联邦制最好的反映。这是谈到

¹ 本文原载于《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ume 19，Number 2 (April 1996)，第 391-410 页。

联邦主义或联邦社会经常提及的内容。换言之，联邦制要容忍，也要求对联邦理念作出社会承诺，在这种理念中，地方特征要同时被维持在国家与地方范围内。如博杰斯（Burgess）指出的：

联邦制的天赋在于其能够无限地适应与调和竞争中的、有时是冲突中的在一个国家内带有政治突出点的异质组合。宽容、尊敬、妥协、讨价还价和相互再认识是它的秘诀，而“联盟”与“自治”并存是它的秉性。

验证基于“控制与平衡”的俄罗斯联邦理念的虚弱性是这样一个问题：不管在中央还是地方，多数主义民主只有微弱的发展机会。如最近总统工作文件就俄罗斯地区问题直陈到：“俄罗斯需要创造一种能够坚持和刺激民主进程的环境，一种面向整个俄罗斯社会的民主学校。”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前苏联俄罗斯的联邦化，特别指出最初基于向民族共和国妥协建立联邦所产生的问题。第二部分认识和分析了与民主化和市场化同时开始进行的联邦国家建设所引发的紧张关系的主要领域。第三部分在资源动员理论的分析框架中认识联邦走向分裂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前景。

从适应到边缘化

对联邦制的支持进展微弱，更多地归因于联邦主义的概念还象是民族共和国与苏联统治的那种受到蔑视的结合。如同前自治共和国一般被看作“苏维埃联邦主义的门面”一样，俄罗斯当前民族共和国的人民只被赋予了在他们地区事务上很少的自治权，甚至远不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亚美尼亚或摩尔多瓦。在一些方面自治共和国更与“内部殖民地”的特征相似。

首先，作为自治共和国，在行政和文化事务上他们仅被给予有限的区域自治；当地的党和国家机器，俄罗斯人所占成分不定，只对中央的利益负责。当地的文化与语言权利受到严重限制，远超过加盟共和国，民族教育广泛地使用俄语。总之，民族共和国被施以广泛的政治与文化的俄罗斯化：在苏联解体前夕，将近一半的卡累利阿人和四分之一的科密人，乌德穆特人，马利人（Mari），卡拉什人（Karachis）和切尔克斯人象讲母语那样讲俄语。

其次，他们的经济停留在初级资源基地和核心依赖的状态。地区过度专业化的特点是与当地初级资源开发联系在一起，这构成了当地区域经济的性质并造成远比加盟共和国程度严重的受到限制的和依赖性的开发。与经济殖民主义的形式对比，其结果是为了中央决定优先考虑的经济利益，民族共和国的资源被严重开发，通常还伴有远期的地方环境后果。

第三，作为这种地区生产的专业形式的后果，“受到限制的社会分层”在多数民族共和国刻下了烙印，在这种分层中土著人口大多集中在初级经济活动中，只有少量的土著人城市中产阶级。更专业的城市岗位倾向于由俄罗斯移民填充，移民的过程成为当地自然资源开发的一部分。因此，在每个民族共和国内，都存在着一种种族劳动分工，土著人口大多留在初级经济部门，反之俄罗斯人更可能在城市里的专业管理、技术和行政岗位上出现。结果是忽略中央对生活水平地区平等的承诺，地区间的差别持续了下来，一些苏联最低生活水平标准来自民族共和国。实际上，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现象仍在车臣、楚瓦什、印古什、北奥塞提、达吉斯坦、卡巴尔达-巴尔卡尔、马里-埃（Mari-EL）、摩尔多维亚和卡尔梅克持续着。

在俄罗斯向国家地位过渡的时期（1990-1991），一个更加民主化的联邦，重新调整中央和民族共和国关系的重要基础，被它的国家建设者们耽误了。对于俄罗斯首任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来说，这样一个再次任命的联邦职位有许多吸引力。首先，在支持俄民族共和国自治要求上，叶利钦看到加强自己权力基础并逐渐削弱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位置的办法。于是叶利钦公开鼓励俄罗斯自己的民族共和国声明他们作为政治实体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作为回报，一些民族共

和国联合抵制戈尔巴乔夫 1991 年为保留苏联所做的最后一分钟的全民公决。这时民族共和国表现出对叶利钦和对建立独立的俄罗斯的支持。其次，联邦化提供了一个加快莫斯科所承诺的国家民主化的办法。1990 年左右，叶利钦坚持俄罗斯能够有效率地民主化的唯一途径就是“自下”重新构造国家。为此他请求民族共和国拿走“你能拿多少就拿多少的独立”，这些话他在六个月后的一次讲演中再次强调。最后，一个联邦计划被看成一个避免俄罗斯瓦解的领土战略。凭借接受这样一条调和主义的路线，叶利钦不仅开始避免使中央变成正在上升的挫折与仇恨的焦点，而且实际上也试图转变对分裂主义的支持，后者阻碍了新俄罗斯维持疆域。

在向建立一个俄罗斯人国家的转型中巩固了民族共和国的支持后，关于主权的争论自然抬高了苏维埃联邦应该确切地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两种主要思想流派出现了。首先是 1990 年 11 月所谓的卢曼切夫计划。并不以民族原则基础的眼光看待联邦，议会宪法委员会特别是其秘书，奥列格·卢曼切夫，提出替代建议：俄罗斯应该转向建立德国“兰德式”体制，在其中设置 50 个左右非民族基础的区域单位。这个建议的意图是为了保证地区间公民权利的平等，在一些公民地区仅凭种族身份将不能受到比其他地区多的特殊待遇。据此，前俄国 oblasts（地区）将被转化为共和国，确保公民们，不考虑他们的居住地，享有同样的权利。1992 年 1 月被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采纳的另外的建议，支持在民族共和国和州之间作出区分，虽然象一个临时原则。它区分出那些共和国和建立在民族指标上的州，引起争论的是，他们应该有权制定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建立自己的政府和在联邦政体内拥有自动代表；而那些非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有权拥有自己的特权和规定自己的立法程序，无权拥有自己的宪法。

事实上这些建议反映的是民族共和国和非民族州之间的紧张关系。当前者被取消特殊身份、只承认他们文化差异的卢曼切夫计划震惊的时候，后者被最高苏维埃的决定排除在外，事实上，决定造成公民分为两个阶级：生活在联邦里的公民（民族共和国）和不得不服从统一国家统治的公民（非民族共和国）。无论如何，民族共和国成功地占据了高地，部分因为他们已经采取了初步行动，声明莫斯科已经正式忽略移交的自己的主权。由于担心分裂行为会随着莫斯科提出的任何取消民族共和国已经掌握的土地特权的宪法建议而来，中央变得温和了。结果只有 21 个民族共和国中的两个——鞑靼斯坦和车臣拒绝签署 1992 年 3 月的联邦条约。其后果是民族共和国被给予了一定范围的权力，包括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各州则没有这项保障。总之在这项方案中，地方与联邦的权力边界既未获明确界定，也未成为在一定范畴内普遍适用的权力。

随着进一步的关于宪法的争吵和修订，新的联邦条约在 1993 年 12 月成为俄罗斯新宪法的基础。然而新宪法被广泛认为在民族共和国内废除了许多原来联邦条约包括的自治权力。结果只有 21 个共和国中的 12 国选民在宪法全民公决中投了赞成票。

新俄罗斯宪法事实上并未达到许多民族共和国起初设想的主权范围。尽管宪法接受了民族自决的原则，但第 4 款使其无效，该款保证俄罗斯联邦领土的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样就优先于分裂的权力。在这里，对中央和民族共和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核心的打击是联邦宪法取消了民族共和国分裂的权力，如果他们希望这样，从联邦来说，这种权力曾在 1992 年原来的联邦条约中规定了的，但被中央主义者特别解释成如同对俄罗斯作为一个完整领土实体的废除。如同民族共和国所看到的，这是对民族实施基本权力的否决，如果他们想要这么做，民族自决权是一项即使在苏联统治下对加盟共和国也在理论上注明有效的权力。

与后来现代民主制度中的联邦制相比，联邦宪法也违背了基本原则，中央当局不可能单方面重新解释地方政府的权力。在苏维埃宪法中，总统被赋予两项权力：司法审核权（这项权力可以暂停俄国各省执行机构发布的规定）和联邦与地方机构或联邦立宪议员间的仲裁权。实际上，一些民族共和国，明显地是巴什库尔斯坦、鞑靼斯坦、雅库特和土瓦，在采用他们自己的宪法的

过程中已经声明他们本共和国法律的至高无上超越俄联邦法律，这侵犯了新宪法，新宪法禁止联邦内的共和国与州进入与国家基本法抵触的立法程序。

联邦政治和民族紧张关系

俄罗斯的转型是从最初声称构造一个分权的联邦转变到建立一个更加集权的联邦，但联邦权力对共和国和州广泛地失效造成逐渐破坏联邦稳定的威胁，抬升了分裂的可能性。这个观点尤其可以在三个不同层面的紧张关系中得到证实：联邦和民主之间不稳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地方文化控制权和自治间的关系。

当俄罗斯声明承诺将把联邦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集体时，共和国却在指责莫斯科加强行使“中央的指令”。叶利钦于1993年10月解散议会和随后3个月取而代之的仅以总统命令统治国家的行为被地方各省广泛地看作是中央所承诺的联邦民主的软弱性的象征。可怕的是，俄罗斯，带着它具有历史传统的中央化的推动力，正滑回中央集权主义，联邦将只成为一个虚名。从另一面看，无论如何，集中化控制也是莫斯科对来自共和国和州的强大离心压力的回应。根据托顿（Talton）在关于联邦主义的具有启发性的文章中指出的，在政治中，地方是以一系列指标（如种族、语言、经济发展）的差距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缓解紧张和不一致……要求不仅进一步承认差异和他们在不断增强的联邦化的复杂过程中的保护意识，而且更需要加强协调和系统内中央集权的强迫。”被托顿（Talton）清晰涉及的，如莫斯科事实上正是，“当差异占优势的时候，系统内的分裂主义潜力很大，而统一则将要求控制，以克服分裂的离心倾向和势力。”

如衡量器一样，莫斯科的许多中央主义者呼吁建立一个“严厉的联邦”，民族共和国和州对中央有更强的依赖，他们坚持认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俄罗斯就不可能有效地实行向市场所有制的转型。这个观点不仅由民族主义权力派，也由一些赞成民主制度的人向前推动，后者坚持只有中央施以更强有力的领导经济改革才能成功。实际上，在联邦政策的某些方面，为“控制地区民族主义”的中央建设战略已经出现。包括在民族共和国内通过提高俄语作为地区间交流因素的重要性重新强调双语制的必要。当然更彻底的是牵扯到强制措施的新设置。这包括对强硬的共和国实行具威胁力的经济制裁，最明显的是在1991-93年针对鞑靼斯坦，在共和国不愿签署新联邦条约的行为发生之后，武装当地以俄罗斯人为主的赞成联邦制组织对抗北高加索民族主义分裂主义运动。无论如何，为保证联邦的控制，中央愿意做到什么程度无疑表现在1994年12月决定派遣俄军进入分裂主义共和国车臣，这是自15年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没有先例的大规模军事干涉。

对具有当地基础的民族主义的潜在分裂势力敏感的中央，这时允许民族共和国在管理自己事务上比联邦其他州有更大的余地。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中央对省级官员的任命上。与其他州级单位相反，民族共和国免于由中央执行机构强制任命只对总统负责的主要行政官员，被允许决定他们自己的政府体制和选举高级官员，包括他们自己的国家领导人。结果莫斯科表现出愿意实施一种不对称的联邦制形式，其中潜在问题最大的地方被自相矛盾地允许具有最大的弹性。在意料之中，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受到批评。俄罗斯各州的辩驳不仅在于对这些州的行政人员的任命削弱了当地的民主自治政府，而且一种后果是与“享有特权的少数民族”相比，他们正在被另眼看待。

无论如何，不考虑通过地区自治表现出的对民主的呼声，在民族共和国内部，一个错误的假设是民主必然在日程表上占据显要位置。如同其他地方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一个错误的论断是对地方负责的渴望自动地带来更大的地方民主。至此，在政治理论中不存在任何基础可以断言

较小的领土单位必然更欢迎民主政治。在俄国及其各省，由于市民社会尚处在萌芽发展阶段，反对当地集权化倾向的力量是微弱的。这部分地表现于具有提醒意义的当地选举的低参与水平。在俄罗斯各州 1994 年的选举中，参加率如此之低以至于许多地方的结果被宣布无效，因为他们没能吸引必需的 25% 符合条件的选民去投票站。在一些民族共和国，如摩尔多维亚和卡尔梅克，服从权力的倾向已经明显。在这些事实上的主权国家，保守的领导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苏联末期掌权，能够为“半服从”的统治方式辩护，声称这可以在政治动荡的年代提供社会稳定和经济方向。进一步地说，这些政治领导人也希望并能够用打民族主义这张牌为他们的行为辩解，这些行为基于的逻辑是只有通过强大和团结的“地区国家”，地方利益才将受到保护，免于遭受来自中央和市场方面无政府状态的侵害。

中央和地方经济关系的性质也是一种关键性的紧张，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联邦的议事议程。特别是三个问题起决定作用。首先，存在一个地理经济不完整性。70 年中由中央领导的地区间的经济协调被各地独断专行的混乱所代替。从作为中央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开始调整被证明是极端痛苦的，作为中央计划的一部分，每个共和国和州被告之生产什么和市场在哪里都曾是有保证的。一种症状就是地区间贸易崩溃，地方生产的恶性下降更加重了这一点。为应付这种局面，各地倾向于追求自己的自身经济利益，包括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如消费品出口配额。

其次，存在一个问题，即在什么水平上——中央、地方或大区，政治家们可以为当地成功地转向市场提供最有效的保障。在这方面，中央对地方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有效的经济政策，包括在各州之间的商品供应与需求上尽量避免分裂的政策。实际上，1992 年盖达尔改革派政府时期是一个短暂的例外，该政府认为保证市场改革的关键就是经济分权化，这曾是一个来自中央的作用有限的方向。放弃这种向市场交换的转型意味着中央被民族共和国和各州指为无力为缩小经济分裂的范围提供有效的领导。这包括为中央明显欠缺有效实施市场改革的地方政策。

在地方国家（民族共和国与州）层面上，许多经济转变的最初行为正在发生。通过在政策上实行更大的控制影响当地经济，各地发现这样一种利用自己的资源重振本地经济优势的战略也是集权的。尽管这些政策与达到向市场经济成功转型的承诺一路同行，但许多民族共和国的地方政治精英，他们懂得需要在进行结构调整和牢固维持其选民支持之间找到平衡，出于恐惧一个过于彻底的政策会削弱他们在当地的权威，他们抵制转变得太快。结果是许多地方领导人继续为他们的国有重工业要求最大限度的联邦政府补贴，延缓作出将导致工厂关闭和大规模失业的决定。并非巧合的是，那些人均联邦预算补贴率最高的共和国也正是那些私有化最慢的共和国。

其他一些民族共和国继续采取一系列更彻底的经济政策，同时也向着在全球经济中找到他们当地市场位置的目标采取一些量体裁衣的初步行动。卡尔梅克共和国处在西南部最边缘。为了摆脱作为俄共和国中最穷者和经济生存能力最低者之一的处境，卡尔梅克采取了一个市场自由化的长远计划，旨在改变经济结构，从单一的、农业与其他初级生产的出口依赖型，通过建立一系列具有竞争力的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变为更具经济多样化的经济结构。这个经济振兴计划欲通过免税的刺激依靠外来投资，以结束共和国对来自莫斯科的经济补贴的依赖。不过这也是一个在加强本国实力的想法下伴以承诺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其中保证经济增长优先于促进多数主义民主。

不是简单地追求“单个儿去干”，大多数民族共和国和州已经开始采取一种大区经济发展合作战略。这使得在共同的自身经济利益基础上构建一个地理经济力量集团成为必要。在现有的 8 个地理经济集团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西伯利亚协议，其成员包括了那里所有 19 个民族共和国和州。1990 年 11 月协议宣布生效后，它建立了一种协调该区域经济改革的办法，也提供了一种更强大的地域权力基础以确保利益共享，这涉及对当地巨大的自然资源库带来的财富进行更多的分

配控制。1992年7月，一个陈述地区组织基本原则的宪章被其成员批准。在承认其政治权威的情况下，莫斯科事实上做了铺路工作，不仅是为一个更有效率的“西伯利亚利益集团”，也是为沿着被西伯利亚协议接受的线索构造其他地理经济力量集团。尽管这个协议未能避免其内部的地区间紧张关系，最明显的是这些民族共和国中最大的和经济实力最强的雅库特与其他地区的关系，但协议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向促进合作的方向取得进展，明显的是关于如何最好地利用西伯利亚未开发的物质潜力促进各地更均衡的发展和如何以最佳的方式将西伯利亚作为全球投资场所出售出去。

最后，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被财政联邦主义祸害了，在财政联邦主义中，民族共和国和州应该为联邦预算做什么贡献，而这些预算资源该如何在分配。在这个问题上，中央被视作在财政收入上对穷困的地方要求得太多，而作为财政任务加重负担的回报，民族共和国和各州感到他们没有从联邦预算得到他们应得的公平的数额。由于大的数额需由联邦预算作出分配，争论在于，民族共和国和各州不得不砍掉许多必要的当地公共开支用作经济投资和社会福利，其作用如同刺激当地发展的刹车。

出现的一个特别的争论焦点是财政预算政策使得民族共和国和州之间不断加剧对供不应求的联邦资源的竞争。这种再分配政策给民族共和国带来的好处，看起来并未反映出对地区平等的认识或需要，反倒象是地理政治杠杆和地区游说的无效。实际上，那些在联邦开支中支付最少的民族共和国，得到了中央最大补贴的一部分。在1992-1993年间，各州的人均纳税总体上高于民族共和国，其中一些民族共和国，明显地是巴什克爾斯坦，然后是车臣、印古什共和国，雅库特和达吉斯坦几乎根本没纳税。民族共和国也从预算分配中得到最多的好处，最显著的是科密和北奥塞提共和国。另外，除了3个共和国（摩尔多维亚、乌德穆尔特和楚瓦什）例外，所有民族共和国都得到了净补贴，同时49个州中的47个在税收上贡多获少。

关于文化权利的争论也正在影响中央和民族共和国的关系，民族共和国希望通过推广本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和宗教重新拥有他们的地方特性。宪法中关于这种权利要求的内容在民族共和国中流传广泛，在新俄罗斯，应该享有优先地位的“是个人和他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还有，集体的权利，如种族的、语言的或宗教的权利，其次重要。因此民族共和国对莫斯科关于一个联邦的俄罗斯的承诺始终怀疑，在那里，他们作为种族公民的权利未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

民族共和国认为在文化上的不同是他们的权利，以制度确立这一点被解释成与一个联邦结构相悖。在这种结构中，一个强大的对地方无动于衷的中央可能热衷于通过再次制定俄罗斯化的政策重建自己的文化霸权。这种忧虑特别来自在民族共和国内有相当数量的俄罗斯居民，以及担心这些当地俄罗斯人被再次利用为中央策划的俄罗斯化政策的代理人。在鞑靼斯坦共和国，许多鞑靼人忧虑随着他们的政府与俄罗斯签署了1994年2月联邦条约，实际上结束了鞑靼斯坦为期3年的事实上的政治独立，共和国政治与文化的俄罗斯化的道路已经开放，而中心在于东正教和俄语的共和国五分之二俄罗斯人口的文化实践，可能为边缘化鞑靼文化提供一个建筑集团。

然而在推广当地民族文化上，许多民族共和国也被中央指控为采用过分突出民族主义特点的文化控制形式，甚至转向制造当地的民族阶层。这加深了土著民族与当地俄罗斯人的紧张，其后果是许多俄罗斯人，因恐惧他们的未来而大量离开。这种恐惧并非没有根据。少数民族共和国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建议界定当地公民，参加共和国选举的权利将只对那些属于当地土著民族的人开放。在一些伊斯兰文化在当地占统治地位的共和国，对建立一个原教旨主义国家的恐惧也导致了当地俄罗斯人的忧虑，明显地是在穆斯林共和国巴什克爾斯坦和鞑靼斯坦，虽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仍然停留在当地政治生活的边缘。

民族动员和分裂的潜力

联邦制不能解决但可以控制中央和民族地区的紧张关系，然而如在车臣危机和莫斯科对其的处理当中所充分显示出来的那样，对联邦制是否适合阻止俄罗斯的分裂存在着忧虑。不过经常被类似解释掩盖了的是分裂主义运动需要“资源”以确保民族动员。因此，按照资源动员理论的描述，仅仅是委屈无法构成分裂主义的充分条件。而且，为集体行动提供的政治机会也依赖于政治资源的有效性。根据我们的建议，4种资源可以被认作特别适宜发动和推进集体行动：政治机会结构、当地精英的角色、社区的意识和经济活力。

好的政治机会结构无疑可以为民族动员提供便利，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米德维尔(Meadwell)的论述所揭示的，联邦本身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即联邦制度所包含的“制度能力”，显而易见的是一系列政治杠杆和接触资源的通道，这不仅更容易进行选民动员，也为分裂主义者大声发言提供了途径。结果是国家自身象一个共和国精英与中央的角力场。无论如何，如果通过加强对政治力量的集权化控制而刺激了冲动，随之而来的前景必然不是降低了分裂的危险。在某些情况下，一种基本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可能变得更有希望，因为中央国家限制冲动爆发渠道的做法更象是在做动员。甚至如果在这种情形下分裂主义能够在民族共和国的层面赢得更多的支持，它依然能被一个愿意而且能够限制集体行动有效机会的强权国家“自上”地控制：归根结蒂，俄罗斯的前辈，那个苏维埃国家，在70年中成功地包容了其广袤的多民族帝国中的民族与地方差异。

对联邦使之生效的那些机会的利用主要是所谓的“民族经纪人”扮演了政治领袖的角色，特别是在联邦政治中他们被给予了战略性重要地位。现在在大多数民族共和国的人员结构上都有一个在最近这些年中已经变得更加有名无实的土生的政治精英群体。这个精英层是苏联时期的产物，而并非来自市民社会。这样尽管在 perestroika (“改革”) 时期(1985-90) 这个精英群体在人员结构上变得更加土著化，但对个人来说它基本没什么变化，未受苏联解体的影响。这个政治精英群体也不得不限制他们自己在省级政治活动中的职业抱负，部分原因是他们缺少在他们自己的民族共和国区域之外的进步的机会。如果俄国将以带有更多西方式联邦制特征的方式转变，提供确保精英动员所必须的可能的机会结构，避免联邦丧失领导权也很重要。总之，目前“由于仍然没有有效的政党结构以将地方政治家的角色在国家的层面上连接起来，大多数地方政治家……不受任何可以使他们遵守莫斯科的政策党的纪律的约束。”这样的精英群体自然倾向于从共和国的视角使用联邦政治的概念，为从联邦获取最多的利益而大量利用“主权”和“民族自决”的呼声。车臣是一个例外，它要求完全的独立国家地位而未获成功。

如果一种政治领导权是在民族自决的政体中使用的话，它要求一个文化特征标识更明显的民族共和国社区，更容易提出“民族”自决的目标。特别是在这一点上，民族共和国在文化相关职业里过份渲染拥有他们自己的有头衔的知识分子，获得相应职业地位和身份的这些人，在对一种以头衔为基础的社会身份的生产和再生产中有他们特殊的既得利益。这些政治经纪人面临的问题是，作为分裂主义民族主义的潜在支持者，他们需要吸引选民，而这些选民的一致性被多元和瓦解的各种标志——语言的、宗教的、阶层和种族的，极大地削弱了。于是当联邦通过政治多元化为这些经纪人提供了资源的时候，社会和教育制度正支持重新发现或再造一种前苏联的标志以及实施“民族化工程”，这些支持旨在重新确定国家标识，这些标识通常不大容易确定其范围。长期的俄罗斯化模糊了曾经清晰确定的语言边界，同时对于当地劳动力的民族性区分的意识正在淡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前苏联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上层实行本土化的结果。进一步地说，不仅由于1917-1921年间在一个更大的、民族混合的国家建立过程中奠定了基础，这些有称号的民族无法回头以强大的身份资源，这种资源来自于原来关于前独立国家地位和政治主权社区的意识，动

员它的人民采取集体行动。

种族性质也能够将动员的潜力非政治化。在一些民族共和国，特别是达吉斯坦和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土著民族内部不一致，对民族和区域自决的不同理解分化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使其争夺对当地政治的控制权，一个无耻的中央可以凭借其优势利用这些作为其分化和统治政策的一部分。当地俄罗斯人的立场也很重要，在将近一半的民族共和国中(Adygeya、Buryatia、Gornyi-Altai、卡累利阿、Khakassia、摩尔多维亚、乌德穆尔特、科密和库雅特)他们占多数，另外一些地方他们也有可观的规模(车臣、印古什和达吉斯坦是明显的例外)。尽管许多俄罗斯人支持当地自治，但在那些新近来到共和国的移民当中，当地身份意识还很淡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当地的俄罗斯人更容易继续认同和支持他们地域上的家园——俄罗斯的领土完整，这不仅因为从俄罗斯分裂出去将使他们的身份从作为多数民族的一部分变成少数民族，而且他们的民族权利、就业前景和社会地位更容易受到挑战。这样在许多共和国中他们即使不是多数也是规模可观的，任何关于分裂的全民公决更可能得到的结果是支持继续成为俄罗斯联邦一部分。

最后，难以站住脚的理由是认为分裂将得到支持，而不需考虑对一个共和国来说经济上可能发生的成本。尽管民族共和国都没有一个“信息团伙”去关注非联邦制可能衍生的经济含义，然而他们对成本与收益的预计流程正在作出判断。在这个(民族共和国的)总列表的一端，是象卡尔梅克和土瓦这样的比较穷的共和国，它们仍然严重依赖莫斯科的大量经济补贴。他们经济依赖的本性和继续作为较大的联邦贸易社区的一分子所带来的实际好处对他们来说可能比作为民族国家所需的更大而捉摸不定的经济支出更有价值。在另一端是天然资源丰富的民族共和国，如库雅特、鞑靼斯坦和巴什克尔斯坦。在这里，国家地位不太可能会导致它们在一夜之间成为“欧亚大陆的科威特”。即使在有些民族共和国中，一个潜在的分裂主义的领导层也将面对一场艰难的斗争去说服选民相信，相对安全的“国家”市场应该被在一个国际贸易体制中可能更不确定的市场位置替代。成为一个国际贸易集体的新成员至少在短期内必然带来一些经济的和社会的负面后果，如果民族共和国不愿意承受这些后果，更能接受的和更可能出现的办法是继续坚持一个地区主义的、而不是分裂主义的战略，同时坚持走自治道路，这条道路指引的方向是更多地参与全球经济体系。

结束语

一个前集权主义联邦的未来基于中央和民族共和国一起促进民主实践的能力。这要求联邦的制度、协议和程序要植根于民主实践，联邦主义社会基础没有得到发展的联邦是不可能兴盛起来的。为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复苏而继续走向高度集中化联邦道路的，可能由重新兴起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引起的中央的干预可能变得过分严重。到那时，可以看到，通过对他们地区主义的，而不是分裂主义的要求进行限制，民族共和国被授予一定范围的民族自决权，以避免联邦彻底失去这些有价值的成员。

(英文参考书目从略)

熔炉，沙拉碗——还是大蒸锅？²

——中亚地区民族和宗教意识的操纵和动员

Shirin Akiner

王璇 译

摘要：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亚地区的民族和宗教意识问题，已经经历了重要的变迁和改变。在沙皇和之后的苏联统治下，这种从一种意识到另一种意识的变迁，发生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和一个更大的政治组织的框架内，区域性的敌对和不满情绪可以被抑制，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会受到强有力的镇压。今天，在当地冲突的解决中，已没有超级权力的干涉。同时，被高速增长的人口增长加重的经济压力，给予这些新国家资源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些进而加剧了社会的紧张状况。然而，除了在塔吉克斯坦境内发生的战争外，（苏联解体后的）这5年来是异常和平的。也许，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这种平衡能否持续下去。

关键词：中亚；民族；民族关系；伊斯兰；少数民族；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

“中亚”一词与“远东”、“中东”以及其它广义上的地理划分一样，并不是精确的定义³。这个词长期被用来大致指称从伏尔加河到黄海、从西伯利亚到喜马拉雅这一地区的任何部分。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它开始获得了一个特定的政治涵义，成为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集体名词。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总共包含了4百万平方公里左右的领土，大概是法国面积的8倍。往北，与俄罗斯接壤，东边是中国，南面是阿富汗和伊朗（和一个很近、但并非直接的、隔狭窄的Wakhan走廊相望的邻居巴基斯坦），西边是横跨里海的阿塞拜疆和俄罗斯。这片地区将在本文中被指称为“中亚”并且成为文章的关注点。

从没有记载的时代起，这片区域就已经成为不同种族与宗教信仰的人们交往和贸易的地方。在早期的“熔炉”阶段，体质上与文化上的同化程度都很高。直到封建时代晚期（就中亚历史而言，可以确定在15世纪和18世纪之间），早期国家开始出现⁴。在沙皇及其后远为系统和全面的苏联统治下，已经萌芽的民族意识开始具体化，同时审慎地保持了与主流意识形态在形式上的一致。民族的多样性与苏联的“沙拉碗”民族政策相结合，并受到了政治系统的一元化权力约束。潜在的惩罚性军事制裁的威胁，加强了这种权力；如果象征性的、被动的民族意识，显示了卷入一个更为活跃、更少软弱性的、群体动态的迹象，这种威胁就可以迅速施加。

今天，在苏联解体的余波中，中亚诸国进入了一个民族建设的新阶段。这一工程的大部分涉

² 本文原载于《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ume 20, Number 2 (April 1997)，第362-397页。

³ 关于“中亚”一词的定义，参看Sinor（1990：1-18）；Frank（1992：1-7）；Yapp（1993：1-10）。

⁴ Starushenko（n.d.，：13-32）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做了一个简要的调查，定义了将民族划分为“部落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民族群体”等的分类法中的主要历史种类的特征。“原始民族”一词在这里指聚居的部落共同体，尽管结构松散，很不固定，却开始显示出足够数量的共享特征，使得将他们归于一种群体意识，或者从此时间向前上溯一个相当一致的群体历史，成为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与Smith关于ethnicity或者民族共同体的定义相一致（Smith，1981：66）。

及到对过去历史的重新审视,其中一个特征是建构尚有争议的历史的必要性,挑战已被接受的“殖民”叙述的学识,以及“殖民”叙述植根于其中的欧洲/俄罗斯人高级而中亚人低等的假设;另外一个特征是“对传统的发现”,作为通过暗示后苏联时代的秩序与前殖民时代的制度、标志和仪式的遗传联系,使这种秩序具有合理性和可靠性的一条途径;第三是使现在对民族领土的要求合法化的需要,主要通过证实苏联之前时代的占领和控制权来实现——这种证实总会涉及到上溯两千或更多年前的、真实或虚构的民族起源;第四个是对“传统”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价值作为新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重新安排(re-instatement),其中很明显的一个方面就是伊斯兰教在公共领域中地位的升高。

后苏联时代的民族建设事业中的这些要素,吸取了“以其族名为共和国命名的民族”(titular people)⁵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然而,这些国家并不是单一的民族集团,而是复杂的、多元的、拥有大量移民的社会。世袭的、一个群体高于和控制其他群体的特权,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对民族主义者(ethnocratic)统治的不满和恐惧。在一个象今天这样社会和经济压力加剧的时代,很容易导致民族的两极分化和边缘化。这进一步激发了潜伏的敌意,或者通过对特定事件的冲动反应,或者通过有意识的民族意识的动员,敌意可以迅速地升级为对抗和流血冲突:这就是大蒸锅。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除了塔吉克事件和其他地方的一些个别事件外,敌意升级并没有在中亚发生。不过,这样一种结果的前提条件无疑是存在的。如果过去的历史能够提供被操纵为可以加剧该地区潜在的民族紧张的材料,它同样也可以证明一段很长的相对和睦的和平共处的历史。现在还不能过早地断言,这些新国家的人民(titular peoples)将会利用这些确实的经历来建立一个所有的公民不管其民族背景如何都拥有一样的权利和机会的全民社会,还是走向好战的民族主义,强化极可能会导致深刻的、或许是致命的社会分化的单一的民族主义者(ethnocratic)权利的基础。为了理解这两方面——一方面是多民族多样性的潜在可能,另一方面是单一民族的霸权——有必要审视最近与久远以前两方面的历史记录。本文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按时代来勾划作为中亚动员因素的民族和宗教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不是说这里使用的阶段化(periodization)方法是指一个组织方法,并仅仅试图反映主要的趋势:详细来说,例外和偏差是存在的。

熔 炉

考虑到中亚处于欧亚大陆中心、横跨主要的南北、东西路线的战略地位,贯穿其整个历史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人口迁移一部分是来源于外部的人口迁移进来,另一部分是人口呈扇形迁向邻近地区。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入侵的游牧部落散布于该地区,其中包括了他们领袖之间为追逐财富、扩大领土或传播新信仰而进行的军事征伐。更恰当地说,商人、工匠、新大陆的探险者、朝圣者和学者都加入了这一地区交错往来的人流。

在古代和中世纪,移入的人口主要是伊朗诸族(这一地区最早的居民可能来源于伊朗东部)、希腊人(公元前四世纪后半叶)、帕提亚人(公元前3世纪)、贵霜人(公元1世纪)、白匈奴人(公元5世纪)、各个团体的土耳其人(大约从公元6世纪开始)、阿拉伯人(公元7世纪)和蒙古人(公元13世纪),大部分人口停留在南部地带(大致相当于今天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⁵ titular people,是指在苏联时期使用其族名来为其“共和国”命名的民族。他们在名义上是这个共和国的主体民族,但实际上,这个“民族”和它的名称本身就常常是“人造”的,并不是历史上已有的或自然形成的。对这一复杂现象,目前没有比较完善的译名,本文中根据不同情况翻译,并注明原文。

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范围),只有土耳其人和更为稀少的蒙古人分布于整个区域内。土耳其人逐渐吸纳了其它族群,然而在南部,定居下来的伊朗人保持了他们自己独特的民族意识。后来,一些游牧的土耳其人也开始了定居、半定居的生活方式。

考古学的证据和现代中亚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显示,不同族群间通婚程度很高,文化同化的趋势也很强烈。实际上,融合是这一历史阶段及以后的中亚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语言上,大量的词汇借自于特别“博学”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以及游牧民族功能较为有限的语言。终于,大部分被形形色色的移民带到中亚来的语言停止了使用,到14世纪,土耳其的各种语言在这一区域的大部分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出现了几种土耳其语的书面形式,方言的种类也同样广泛⁶。然而,在东南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和塔吉克斯坦),伊朗方言仍然顽强地保持着。在城市里,正统的法尔斯语(Farsi,波斯语)依旧是行政机关、科学、哲学和文化的主要用语。两种因素具有同等地位的双语土耳其——伊朗文化形成了。因为这种共生现象,两种语言都没有成为与另一方有关的民族意识的制造者。

在中亚的定居区,有着相当多样的宗教,波斯教和佛教信奉范围较广,也有大量的基督教会(Bartol, 1964: 265-302),游牧民族是万物有灵论者和萨满教徒。伊斯兰教于7世纪时被阿拉伯人介绍进这一地区,到8世纪中叶已经在定居的人群中确立起来。在仅仅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梅尔夫、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城市已经成为伊斯兰科学和文化的主要中心。中亚的一些学者,如伊本·西拿(阿维森纳)、法拉比、布哈里、比鲁尼和花刺子模(al-Khwarezmi),声名遍及整个的伊斯兰世界(然后是欧洲)。游牧民族的伊斯兰化稍晚一些,道路也更不平坦,部落中的贵族大概早在10世纪就采纳了新的信仰,然而他们的属上要经过一个更长的时期才会皈依,并且仅仅是表面上的⁷。

随着伊斯兰教的引入,其它的宗教渐趋消亡。实际上,到14世纪时,整个中亚已经至少名义上已是穆斯林国家,连邻近的国家也几乎都是穆斯林了,例外的只有中国和准噶尔(在中国西北部,与哈萨克和吉尔吉斯接壤),与他们的接触是零星的。因而,中亚人实际上居住于一个他们与邻居拥有共享的共同信仰体系、共同的制度、共同的社会和文化价值的世界上。在中亚人和他们经常接触的其它人之间不存在一条“界限”,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教行使的职责也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民族的塑造者。实际上,即使在中亚内部,伊斯兰教也有多种形式。以前这一地区信奉的种种宗教,结合进了当地对于伊斯兰教的信仰和仪式的阐释中。例如,在一些地方,古波斯教(拜火教)的成分就深植于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仪式中;同样地,万物有灵论和萨满教的信仰也简单地掩盖在伊斯兰的虔诚的外表下(Basilov 1984: 30-47)。除了形式复杂的伊斯兰教的“流行”形式,还有教条上的划分。中亚的多数民族,包括大部分的伊朗人,是“逊尼派穆斯林”(哈那菲派Hanafi),而在帕米尔高原(今天塔吉克斯坦东部)还有Ismailis社区。后来,主要是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小群体的什叶派穆斯林移民定居下来(Sukhareva, 1966: 159-60)。可以理解,这两个派别是不同的。就主要的逊尼派人口而言,早期并没有对他们敌意的记载;而更近的时代里,有时这些群体之间会有摩擦,特别是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什叶派和逊尼派社区⁸。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不向常规的同化趋势屈服、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意识的群体。从等级、

⁶ 关于土耳其语言的详细研究, 参看Deny et al. (1961)。

⁷ 关于伊斯兰教在哈萨克人中早期阶段扩展的描述, 参看Auezov et al. (1957: 105); Demidov (1978: 11-42)。

⁸ 最悲惨的例子就是1910年发生在布哈拉的所谓的“什叶派大屠杀”。暴行的主要原因,是在人口中占多数的逊尼派,对在后期的布哈拉埃米尔统治下什叶派(那时民族名称[ethnonyms]是ironi“伊朗”和marvi“Merv”)日渐增长的财富和政治影响的仇恨(Sukhareva 1966: 164-5)。

信仰或者职业上区别于人口中的大部分，这些群体大多数严格保持族内通婚。此外，尽管有时会使用当地的语言和习惯，他们通过流传与他们的全体居民到达中亚的时间和方式有关的民间记忆（不需要历史意义上的精确性），清醒地保持着“他者（other-ness）”意识。最鲜明的群体是布哈拉的犹太人。他们大约于公元 1 世纪前经由伊朗迁入中亚的西南边，到阿拉伯人入侵时，他们已经建立了足够大的共同体，并被伊斯兰当局认为是一个自治的财政实体（同样的还有拜火教和基督教）。他们被允许信奉自己的宗教，但要屈服于一定的法律约束，而较晚的时期（18 世纪末），则试图强制他们皈依于伊斯兰教；在此之前，他们似乎很有理由地满足于与伊斯兰邻居的关系，尽管这是建立在不平等、歧视的基础上的。大民族进入了丝绸和棉纺织业，到 19 世纪（或许更早），他们完全垄断了织染贸易，特别是靛蓝的使用（Sukhareva 1996：165-78）。

阿拉伯人形成了两群：一部分居住于草原——沙漠地带，靠近泽拉夫尚河，另一部分居住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等地的城市中，他们很可能来源于不同的地区。前者（他们将自己的语言保持到现在）是贫穷的牲畜放牧者，大概是作为战争俘虏或经济移民于 14 世纪或更晚来到中亚；而城市居民自认为是最早将伊斯兰教带到这一地区的穆斯林教师和学者的直接后裔，即使后人不再从事宗教职业，他们同样被当地人所尊敬。城市居民比草原上的阿拉伯人经历了更大程度的文化化（acculturation）过程，但保持了严格的排他性，几乎不与他们自己团体外的人通婚（Schuyler 1876：105-11；Sukhareva 1966：149-52）。

游牧部落中的精英们也构建了一个独立的群体，象有名的“白骨（white bone）”，是与平民的“black bone”相对立的。他们将父系的血统追溯到了成吉思汗（Sulejmenov 1969：160-7）。在中亚的蒙古征服者被伊斯兰化和土耳其化、蒙古帝国和它的后继者的国家被分解之后很久，只有成吉思汗家族的一些人可以在大一些的结构中（也就是部落中或可汗的领土上）担任领导职务的传统仍然保持了下来。他们再一次将这种地位归于自己，并被他人所承认和接受。

在其它一些仍然游离于主体人群之外的小群体中，我们还必须提到中亚的吉普赛人。根据他们自己的传说，他们在帖木儿统治时移往中亚（尽管因为时代不精确的历史事件经常被归于这一时期，传说比听上去更为含义模糊），皈依了伊斯兰教并采用了当地的语言。他们自称为 mughat（来源于塔吉克语的 mug/mag“拜火者”），但是邻居们所知道的却是其它的多多种多样的名字，其中最常见的是 luli 和 dzhugi。他们过着一种周游的生活，主要从事马匹贸易、小商贩、补锅匠和算命等职业（Schuyler 1876：111；Tolstov 1963：582-96）。

民族起源（Ethnogenesis）

中亚人们的民族起源（Ethnogenesis）（也就是，不同的部落联合成“最早的民族”）习惯上确定在 14 到 16 世纪之间。但由于文字记载的文献太少，民族名称（ethnonyms）的含糊性，以及传统和风俗上巨大的地区性差异，想在任何程度的确定性上把这一发展过程在地图上表示出来，都是不可能的。到这一时期末，一些群体的组合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高的内部凝聚力，因为谈论“哈萨克人”或“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卡拉卡尔帕克人”和（虽然就象下面将要谈到的，会引起很多争论的）“塔吉克人”成为可能。然而这幅简洁的画面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当代的构造：它传达着秩序、连续性和“历史必然性”的意念，忽略了尴尬的不定性、变化多端的部落结构、正在进行中的同化和分裂过程。在将来的两三个世纪中，情况将仍然是变动的，有可能会朝着与那些最终已经采取的方向截然不同的各个方向发展。

在草原和沙漠上的游牧民族中，现在仍然有经常性的人口移动，引起了持续性的部落群的合并和分裂。共同的民族名称（Collective ethnonyms）开始出现在同时代的记录中，但是在参考资料中其意义经常是重叠地。例如，“乌兹别克”和“哈萨克”的名称在15世纪几乎是同义的，直到16世纪才有了一个界限鲜明的定义（Auezovetal, 1957 (vol.1) 142-3）。相反地，部落的名称要稳定得多，有几个见于中国、阿拉伯和波斯的文献资源，使得个别部落的历史可以（尽管需要进行一些尚未证实的猜测）上溯到公元8世纪或更早（Tynyshpajev 1990：4-27）。在使用一些有特色的标记，如口号和标识（brand-marks）方面，似乎曾经有过一些连续性（Kudajberdy 1990：22），但关于这些群体的民族构成，我们却什么都不知道了。处于核心的组成部分很可能是通过宗谱联系而结合在一起的，但（nimbus）外围则是弥散着关系不太密切的部属。

部落的流动性是这样之高，以致同一部落的人员、或者说是顶着同一部落名字的人员，经常在不同的部落（hordes）或可汗之间被划来划去。所以，一些部落并入了哈萨克可汗的领地，随后成为了哈萨克民族（ethnos）的组成部分；相邻的部落群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他们也扮演着相似的构成角色。因而，如Naimans人，不仅促进了哈萨克民族形成（ethnogenesis），也促进了吉尔吉斯、卡拉卡尔帕克、诺加人（Nogais）乌兹别克等民族的形成（ethnogenesis）；kerei人促进了哈萨克、卡拉卡尔帕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和巴什基尔民族的形成；Uisuns人促进了吉尔吉斯、卡拉卡尔帕克、哈萨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等的形成（Tynyshpajev 1990：27-8）。19世纪晚期，这些跨国界的联系被拥护“泛土耳其”观点的历史学家和活跃分子所强调，却被另一些更严密的国家主义者派别所贬低。

在河间地带定居区中（大致相当于现代的乌兹别克斯坦），定居的伊斯兰人和新来的土耳其游牧民族不断进行互动，后者逐步控制了这些土地；从11世纪开始，这一区域就由土耳其王朝、然后是土耳其——蒙古王朝统治着。逐渐地，尤其是在后蒙古统治时期，他们采纳了波斯文化的一些方面。帖木儿（d. 1405），一个在帝国地域的广阔性上几乎可以与成吉思汗相媲美的征服者，可以作为文化综合的一个示例。作为一个土耳其化（Turkified）伊斯兰化的蒙古人，他把游牧和定居的传统动态地结合了起来。今天，许多乌兹别克人把他看作自己国家精神上的缔造者。然而，他死后，这一地区很快成为了自相残杀的牺牲品，分裂成独立的小王国，直到16世纪在Sheibanid王朝的统治下，河间地带地区才重新统一，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乌兹别克的民族联合发生的时期。

接着，布哈拉，以及后来的Khiva和Kokand，成为了强有力的区域性征服的中心。他们受乌兹别克王朝的统治，用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包括了用今天的分类法将被认为是塔吉克、哈萨克和土库曼等民族的人。到19世纪，这些地区、特别是在布哈拉，受过教育的精英们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意识：可以论证的是，这些标准一度曾经形成了民族聚合的基础，并最终发展成为相当可行的“民族”区分标准，就如在苏联时期创造出来的标准一样。同样，已萌芽的其它民族群体的意识，也可以在不同的条件下被动员和统一起来。其中最大的就是所谓的“Sarts”⁹，这个词是指（有时是轻蔑地）那些以能说两种语言、土耳其——伊斯兰混血、定居、以城市为基础、从事商业为主要特征的人们。到19世纪末，估计有一百万以上的人口是按照这种方式正式地、或非正式地区分的¹⁰。这一时代也在使用的的民族名称（Ethnonym）“塔

⁹ 这个词的词源不太清楚。Kononov（1982：.281）认为它是梵语（？Sanskrit）的一个派生词，意为“商人”或“商队领导”。这个词也用于历史上的年代调查，参见Bartol（1964：304-14）。

¹⁰ 据Kostenko（1880：267-8）的说法，在土耳其斯坦行政区内有690,350Sarts人；稍后，Azijatskaja Rossija（1914：164）给出的数字是1,847,000；在1897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基础上，Masov（1995：61-2）估计那时在俄罗斯的土耳其斯坦的Sarts人有967,000，占总人口的18.3%。

吉克”，是指完全地或主要是伊斯兰血统，而在使用中却是不完全一致的；此外，在生物学、语言学和文化的领域内，“布哈拉人”和“Sart”在术语上交错的，其中包含了大量也许应该被归为“塔吉克”的人员¹¹。因此，尽管微观层次上的民族意识得到了清楚地界定，在宏观的层次上，却有着程度明显的流动性和缺乏正式划分。

殖民遭遇

18世纪，中亚及其附属的哈萨克草原开始并入沙皇帝国，这一过程直到将近19世纪末Transcaspia（现代的土库曼斯坦）的征服才完成。俄罗斯对当地土著民的政策根据区域和时间而有所区别，总的说来，与其它欧洲人的殖民强权相比，他们干涉得较少。对俄罗斯人来说，对中亚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关心优先于对社会状况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当地的行政体系受到了最小的干涉，法律和财政系统引进了一些变化，建立了一些卫生保障和教育设施，但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几乎没有社会互动。

然而，大量不同民族和文化来源的人口到来，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亚人的生活。新的城市环境创造出来，具体体现了陌生的社会组织的原则，以及异己的审美观；新的技术被引进，与之相伴的是新的工作习惯，包括效率、纪律、准时和能干等外来的准则。这些和其它的一些变化共同促进了新的界限的产生，使“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区别具体化了。移民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友好的，但是社会和文化上的距离意识也非常强烈，这在当地人中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对立来解释。这主要不是宗教上的差别（那是基于教义上的不同），而是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文化的不同。“穆斯林”一词可以用来指称任何被认为是当地的和土生土长的事物，与之敌对的就是外来的；象 musulmon tili“穆斯林语言”（指任何当地的语言）、musulmon kuinak“穆斯林内衣”（指一种宽松的、无领的衣服）等表达形式也是这样。俄罗斯政府也开始用“穆斯林”一词集体指称土著民。从民族划分的两方面，“他者”（otherness）被概念化为两类人群之间在社会——宗教上的不同。这样，在几个世纪来的时间里，第一次，伊斯兰再一次获得了一个可以标志界限的强大力量，篱笆圈起了土著民，并把他们这些“有信仰的人”与“异教徒”的外来者区别开来。

与俄罗斯人交往的另外一个后果，也许可以称之为中亚人的“民族固化（immobilization）”——一个与地理上的民族固化相联系的过程，是通过政府的税收政策，如省界的划分、官僚章程和规则等来完成的。在这一时期，俄罗斯学者开始实施田野工作，对当地人的语言、风俗和体质特征进行记录和归类。这些辛劳的研究者的工作仍然极其重要，尤其是对于那些后来定居下来、并丧失了大部分传统文化的游牧民族的历史来说。对这一地区的统计测量和人口统计报告，以及有助于进一步学术研究的语言和人种史研究，建立起了后来构成沙皇帝国、然后是苏联统治基础的分析范式。然而这种分类法是局外人主要基于外在的标志而进行的分类，并不必然与“主体”的自我指示和感觉相吻合。这样，殖民力量的假设深植于学院的和政府机构的叙述之中，为后人固定了一个迄今为止不断流动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状况。而当时殖民世界的其它部分，如欧洲列强，非常轻松、不加疑问地就通过知识——用来理解、命名并进而统治的知识，占据了凌驾于东方之

¹¹ 正如Masov(1995 p.60)利用19世纪的材料指出的，Zerafshan行政区的塔吉克人有三个民族名称（?ethnonyms）：塔吉克、Tad和Sart。布哈拉的情况更为复杂，包括了一部分说塔吉克语人口的自我界定和他人（??alter）界定的不同限定（Sukhareva 1966：117-44）。

上的霸权地位¹²。

与俄罗斯人交往的第三个后果，是形成了政治化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很大程度上局限在（根据这一时期保存下来的极少的材料所可能得到的推断）受过教育的中上层阶级中，也是俄罗斯的教育和政治运动影响的一个后果，就象对于语言、历史和民族志的研究，使土著民的“民族（nation-hood）”概念得到了具体化一样。这种意识首先于19世纪下半叶在哈萨克的分子中显露出来，一部分是由对俄罗斯人的仇恨而引起的，另一部分（或许是大部分，并且是被文献较好记载的部分）是不满于政府发起的鞑靼传教士试图把伊斯兰教的正统观念强加于游牧民族身上而激发的¹³。定居的、受过教育的哈萨克人反对改变宗教信仰，理由是这些信仰和行为是与“哈萨克人”的传统相违背的。后来，随着斯拉夫移民的增加，新生的哈萨克民族主义也采取了反对移民的偏颇立场，这种偏见在1916年的流血暴动中达到高潮¹⁴。在南部，最初的政治动员是由富裕的商人和倾向于教育体系现代化的进步的穆斯林学者和官员煽动的。以“dzhadidism”（来源于usul-i dzhadid，意为“新（教学）方法”）闻名的运动受到了沙皇帝国其它地区的穆斯林改良主义者的很大影响，特别是克里米亚、伏尔加鞑靼人（Tatars）和Azeris三地¹⁵。运动的一些支持者到土耳其学习，对年轻的土耳其国家的政治日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Masov 1991：55）。中亚的新方法运动（dzhadidism）逐渐地获得了强烈的泛土耳其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色彩，在一些拥护者中呈现出了反殖民主义、反俄的色彩。自相矛盾的是，俄罗斯人尽管害怕泛土耳其主义的兴起（与奥斯曼帝国大约两个世纪敌对的后果），却不经意间促进了它的生长。“土耳其斯坦（Turkestan）”（字面意思是“土耳其的土地”）这一历史名词是在沙皇的统治下被重新使用，并作为新征服的南方地区的通用管理名称而具有了政治内容；同样地，Tjurk“土耳其”一词在一般意义上也经常用来指称全体土著居民，与“穆斯林”的含义相同。这样，殖民观念和官僚设施在不小的程度上促进了土耳其民族实体的巩固。

总结一下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夜的形式：中亚意识已经开始限定于与俄罗斯相对立的位置上；伊斯兰教成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最主要的界限标志。尽管与地方主义有一些交叉，一个共享的土耳其意识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基于语言标准的民族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确立；最后，在受过教育的阶级中，新兴的民族意识（nation-hood）已经形成。

沙拉碗：苏联的民族政策

作为俄国革命的后果，中亚与沙皇帝国的其它地区一样卷入了内战中。布尔什维克的军队于1918年控制了关键地区，但不能巩固他们在这些地区的控制。紧跟着，发生了激烈的武装斗争，包括红军和白军之间的派系斗争、外国势力的干涉、民族领导人寻求地方自治权、以及地方军阀领导下的杂乱无章的游击斗争等。绝大多数的当地人是被动的牺牲品，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只

¹² Said (1978, p.32) 使殖民关系中知识和权力之间的连结凸显出来。

¹³ 沙皇政府最初鼓励鞑靼传教士将游牧民族伊斯兰化，作为“文明”进程的一部分（Akiner 1995a, p.28）。Shokhan (1835-65) 和Ibrai Altynsaryn (1841-89) 等哈萨克学者被这些传教士公开批评，认为他们是盲信的，是反启蒙主义者。相比而言，他们更赞同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认为它们有利于塔吉克的社会发展。

¹⁴ 1916年的起义迅速蔓延到了中亚的其它地区，不仅包括哈萨克，还包括吉尔吉斯、土库曼和乌兹别克。那些掌握了第一手情况的人，不久就记载了尚无定论的事件，参见Ryskulov and Broido (1989)。

¹⁵ 关于这一运动的最新研究，由Cahieris du Monde Russe, 37卷(XXXVII), nos 1-2, 1996, 巴黎：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全部是关于这一主题的。

能被来自于各个方面的力量之间的斗争不加区别地攻击和折磨。到 1920 年，布尔什维克占据了优势，许多民族主义运动的成员（包括一些以前的新方法主义者 dzhadidsts）加入了他们的军队。在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共产党的拥护者在苏维埃军队的帮助下推翻了统治者，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的卫星国。游击队员们又继续了十年零星的战斗，但到 20 年代中期，他们已经形不成严重的军事威胁了。而且，由于苏联当局开始进行教育、医药卫生和其它社会服务方面的改革，公众的观点转而反对反叛者，使他们被孤立和边缘化。反叛者中的一部分转而向新政权效忠；其余的进入邻国，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对苏维埃的中亚没有什么可以看得到的影响。

苏联的统治一旦确立，创建一套适合于本地区的管理机构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有三种方法可供选择：将中亚作为单一实体对待；保持沙皇时代的划分；引入新的界定形式。一些中亚领导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都倾向于第一种方式。但是考虑到这一地区的面积、环境上的巨大区域差异性，人口和自然资源分布上的不平衡，从纯粹的官僚观点来看，单一的世界很难实现，而且这一地区以前从未实现过一体化（除了 13 世纪在蒙古统治下名义上的一体化），所以这一地区也没有恰当的机构或组织机制可以促进这一计划的实现。最终，反对这一选择的决定性论据是，它被认为对于中央政府是很危险的，因为（假设可以实现，仍然值得疑问的是）它可能会产生一个拥有足够的土地和经济潜能挑战莫斯科当局的土耳其——穆斯林区域；第二方案就意识形态基础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看起来代表了沙皇主义殖民政策的延续，将严重削弱苏维埃制度的可靠性基础；而苏维埃制度是试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带来自由的、反对殖民主义的力量。

这使得第三个选择成为唯一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对于一个新的区域性管理的界定，没有重要的实用上的障碍；而且，这样的一种方式也明显可以带来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利益。它提供了一个机会，通过在该地区创造一种全新的、建立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原理基础上的社会——经济框架，而与过去决然分裂。这种理论假定民族是一个“历史形成的、稳定的人群共同体，以共同拥有的四个主要特征为基础，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由共同的民族文化的特征所显示出来的共同社会心理”（Starushenko n.d：22）。

对于民族（nation-hood）的这样一个定义，提供了地区划分中参考的一个理论观点，这个观点以在区域性管理机构中，根据当地民族群体的数字规模和假定的社会发展水平，反映他们的等级顺序为目标。然而，那时的中亚人能拿什么、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来证明他们具有了被称为一个民族时所必需的四个特征，是成问题的。因此，民族界定采取什么形式，最初是无法明确的。1920 年 6 月，列宁要求草拟一份“Uzbekaja, Kirgizija 和 Turkmenija”的民族志学地图，和一份详细的关于“将他们合并或分开所需要的条件”的汇编报告（Lenin 1963：436）。中亚的共产党和苏联的官员承担了拿出区域性机构重建方案的任务。

界定的计划通常被认为是莫斯科强加于这一地区的，而最近出版的档案资料（Masov 1995：158-93）揭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情况。当然，划分这一地区是由中央政府决定的，支持最后的界定方案的也是它；此外，当地民众的意见几乎没被考虑：没有公民投票的疑问，也没有试图对当地人的感受进行测量。讨论这一问题的不同方案的，是中亚地区的代表，他们不是驯服的官吏：他们信任党，因而在苏维埃的体系内，也仅仅在那样的结构框架中，他们为保证自己民族群体最好可能的条件而论争。速记记录显示出，代表间的争论是很激烈的——其中伴随着绝非少量的对明显的民族特征的攻击和批评。中亚人联合成一个轴心反对中央政府的证据非常少，相反地，强烈的民族忠诚感显示出了更为热切的、也更为清晰的民族认同意识，远远超出沙皇时代的记载（当然可能非常不完全的）。

争论的主要议题有：第一，是要一个中亚联邦/土耳其共和国（哈萨克支持这一计划），还是要一个独立国家的集团（乌兹别克倾向于这种选择）。正如土库曼代表所说的，非乌兹别克人关心的，主要是如何最好地抑制“乌兹别克的压迫”（Masov, 1995: 165）；第二，边界问题：不管是否在区域性联邦的语境中，一定形式上的行政划分都是一个已被接受的前提，并将给予所谓的“民族区域”以官方的认可。争执的焦点是定义“民族区域”的标准：是基于历史的意义——由于人们的不断迁移、久远的征服与丧失的循环，以及大部分人口的游牧生活方式，绝对意义上的界定几乎是不可能的——，还是根据对特定地区目前的民族组成的统计评估——具有高度的可争论性，不仅因为缺乏准确的数据，更因为存在着许多边缘化的事例，他们的民族意识既不与较大的民族分类交叉，也不是非常独立与有特色的，并且不是某一主要集团的组成部分。例如，哈萨克认为塔什干应该归入哈萨克斯坦，因为它在历史上曾是哈萨克的首府，而且当地目前的大多数人口是哈萨克人；乌兹别克则用不同的历史证据、不同的人口统计数字、不同的民族分类来反驳（举例来说，他们声称以前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群体的库拉 kuramas 人，是乌兹别克“民族”的一部分）。

关于民族界定的争论持续到 1924 年的夏天。最后的决议是建立大民族群体挂名（titular）的民族共和国，但不能有联邦。主要的区域分界得到了通过，尽管在土地上从事实际划分的任务移交给了一个特别组成的委员会。两个新成立的国家立即被承认了加盟共和国的地位，即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被给予了次一级的自治共和国地位（前两个属于俄罗斯联邦，最后一个属于乌兹别克斯坦），但后来提升为加盟共和国。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和戈尔诺—巴达赫尚（东塔吉克斯坦）得到了更低的自治省地位，虽然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后来提高为自治共和国。

不可避免地，新的边界不能使每个人都满意，总会有许多抱怨，在个别地区还有重新划分边界的要求，后来也做了一些调整。不管怎样，在大的范围内，这一计划达成了它的五个目标中的四个，在没有任何人口迁移的情况下，大约 90% 的主要土耳其族群被包含于他们挂名（titular 以其正式命名的）的民族单位的边界中。第五大族群，讲伊朗语的塔吉克人，遭遇没有这么好：当塔吉克斯坦于 1924 年建成的时候，只包括了 60% 多一点的自我认同为塔吉克的人¹⁶。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是当时被别人和讲塔吉克语的成员（或者，至少是他们的一些领导人）认为塔吉克民族意识还很模糊。在为民族界定而准备的材料中，很少将塔吉克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群体而提及；在为调查该地区行政区域划分的各种方案而建立的委员会中，塔吉克是唯一的一个没有被自己民族的代表团提到的主要的民族群体。实际上，几个塔吉克的代表不但参加了委员会，并在委员会的工作中起着领导作用，但是他们将自己认同为“乌兹别克人”，并被正式地列入名单中（Masov, 1995: 82）。此外，在他们的发言中，他们完全支持乌兹别克代表团的立场（不同于土库曼和哈萨克代表团），并且没有做出塔吉克民族单位的领土要求。不过，在当时已经有了塔吉克人的大体意识，官方的记录有时也有所反映，如记录在某次会议上的“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表达的特定观点（Masov, 1995: 104）。这样，塔吉克人还是被提及了，但是以一种很含糊的方式，没有清晰的民族日程。其结果就是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几乎作为一种事后的考虑而被创建起来，坐落于与世隔绝的东南方的高山上，几乎没有道路和够规模的城镇。传统的塔吉克——波斯文化的中心，包括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等大城市，在没有任何反抗记录的情况下，被乌兹别克人占据了

¹⁶ 包括在与他们民族同名的行政区域单位内的土著民（titular people）的百分比（根据 1926 年苏联人口普查的数据）如下：哈萨克人，93.6%；吉尔吉斯人，86.7%；土库曼人，94.2%；乌兹别克人，84.5%；塔吉克人，63.1%。

(Masov, 1991: 47-8)

塔吉克代表团的默许行为,或许可以用这些事实来解释:他们在乌兹别克统治的环境中长大和受教育,他们最初的政治行动也是在一个强大的泛土耳其新方法(dzhadid)运动的语境中开始的。而且,从公元999年以布哈拉人为主的(bukharan-based)萨曼王朝失守,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在中亚的这一部分地区,没有重要的伊斯兰统治朝代。相反,以城市为基础的讲伊朗语的人口,在接连不断的土耳其国家组织的行政机构中,占据着领导地位。以前从没有过象现在提出的那种基于民族——语言的分界线,所以雄心勃勃的塔吉克积极分子,最初选择继续充当一个大而强有力的乌兹别克民族单位的一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情况的迅速改变大部分要归因于乌兹别克人开始强迫讲塔吉克语的人口转而采用乌兹别克语和乌兹别克的民族意识(Masov, 1991: 72)。这最终迫使即使是最消极的塔吉克领导人开始反抗,大多数人确信保护塔吉克文化和民族传统的唯一道路,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扩大化的民族区域单位。这一目标于1929年达成,塔吉克斯坦被承认了加盟共和国的地位,包括一些塔吉克人口为主的地区(很明显的是苦盏[列宁纳巴德]城市和省),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仍然牢牢地掌握在乌兹别克手中。因此,即使是1929年以后,大约仍有25%官方认定为塔吉克的人处于乌兹别克的管辖之下。非官方的估计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数字¹⁷。

用Massimo d'Azeglio¹⁸的话来说,中亚共和国已经建立起来了,下一步的任务是建立中亚民族——或者,更确切地说,苏联的中亚民族。“民族(nationality)”(苏联的用法,这个词意为由种族和基因遗传来界定的“民族意识”,与“公民身份”相区分)有两个主要的分类。在数量上较大的群体,以地域为基础,被安置到一个与他们的民族同名的行政单位(共和国、地区或者分区)中,他们在其中享有某些公认的特权,如获得房子、更高的教育和在政府及专业机构中的挂名(figure-head)职位等,尽管这些特权并未得到官方的批准。而较小的群体(如朝鲜人、回纥人)尽管在他们群体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大多有文化权力(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教育和出版的权力),却没有领土基础。在1930年代,一些群体(如布哈拉的犹太人)的这种权力也被削减了,一些被归入了较大的民族中(在1926年的人口统计中,库拉人(Kurama)是单独列出的,但后来划为乌兹别克人;同样,Taranchis最初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群,后来归于回纥人)¹⁹。Sart的类别停止使用了,原来被这样界定的人现在被划分为“乌兹别克人”或者“塔吉克人”。其它人尽管在数目上很少,仍然被单独地列出来(如阿拉伯人、吉普赛人)²⁰,或许是因为他们更明显与当地的其它群体不同,因而也更抗拒同化的缘故。

创造现代的苏维埃中亚意识的工作,是一项复杂的事业,其中包括了意识形态、历史和行政机构等参数上的相互协调。族群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机制,同时也是族群鉴别的一个重要机制,是民族语言的创造。在南部地带,风格化的书面语言(土耳其语和法尔斯语)和日常讲的方言之间有一条传统上形成的鸿沟;在北部的游牧民族中,书写手段仍然停留在一个相对不成熟的阶段上。新的民族语言在经过选择的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些方言就被用心地整理、编辑成了词典。

¹⁷ 正如Sukhareva指出的(1996: 143),人们几乎不了解这些“民族”标签,有时候一个家庭中的成员(举例说,亲手足)会有不同的界定,一个人会说自己是乌兹别克人,另一个则说是塔吉克人。

¹⁸ “我们已经制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制造意大利人(民族)。”Massimo d'Azeglio在新组成的意大利王国议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引自Hobsbawm 1990: 44)。

¹⁹ 在1926年的人口普查中,Kurama人估计有50,079;Taranchis人估计为53,010。

²⁰ 实际上,这些族群后来并没有被列为特殊的“中亚”阿拉伯人或是吉普赛人,只是他们在某些加盟共和国中的居住区指明了他们的历史起源。

最初使用的是阿拉伯字母 (script) (就象在苏联之前的时代), 但大约在 1930 年人们转而喜欢拉丁字母 (script), 1940 年拉丁手写体又被西里尔字母 (script) 取而代之。在拉丁和西里尔字母 (script) 的词典中, 为民族语言而创建的字母表经过了改编, 以体现每种语言的语言学价值, 因而各个字母表之间的字母也有着细小的差别。语法和词汇的标准化强调了这些语言的奇特性。新的语言形式的使用, 通过媒体、学校、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其它的公共传播渠道得到了应用²¹。

民族建设 (building) 事业中使用的另一个重要工具, 是对从尚在争议中的史前时代一直到当今的民族发展史, 所做的“客观”的西方式的史料汇编。这项工作的绝大部分是建立在可信的学术成就基础上的。偏见, 甚至有时可以说是篡改, 存在于构成意识形态基础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假设中, 它支配了决定着材料取舍的方法论。这种名义上的民族群体的历史, 是作为单个共和国的历史构造出来的, 因而强调的是土地与人口之间的共生关系²²。地图、地理课本和照片集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联结, 促进了个人对国家的自然形状的认同感, 同时把它与其它的、邻近的国家区别开来。文化遗产同样以一种狭窄的民族主义视角出现, 其目的仅仅是对民族神话进行描述和给出物证。这种方法导致了不光彩和与时代不合的争斗——民族界定的工作被区域纷争的回忆所包围——声称中世纪时杰出的文化和科学人物, 如阿维森纳、法拉比、花刺子模 (al-Khwarezmi), 兀鲁伯 (撒马尔汗) 和纳沃伊, 是某一特定民族的“财富”。通过新的文献和当时已有的西方式的艺术形式 (例如戏剧、电影、歌剧、芭蕾、绘画和纪念壁、雕塑), 民族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与普遍的选择主题和思想观点的苏联模式相一致, 但却通过利用特殊的想象以及自然环境、文化和历史的隐喻, 得到了民族建立的基础。国家公共设施的建立, 如大学、科学院、共产党组织、商业和专业联合体 (如共和国作家协会、电影工作者协会) 也有助于促进民族自豪感。同样重要的是, 它们为以其命名 (titular) 的群体提供了获得 (尽管不是绝对的) 特权的权威机构。因而对民族群体的认同, 除社会形式的利益外, 同时也带来的物质上的好处。

民族意识的发展贯穿于苏联意识的发展过程中, 前者植根于对共同祖先、共同语言传统和文化的信仰 (不管是自发的还是被政治活动家煽动的) 以及与在民族区域中的集体历史存在联系在一起的概念。相比之下, 苏联意识却基于非民族的基础: 它代表着单独的民族意识要归入其中的国家意识。由于共和国只是更大的实体的组成部分, 公民身份是属于苏联、而非加盟共和国的。虽然一些区域性政策的贯彻执行要委托给加盟共和国机构, 但政府的主要功能——维护法律和秩序、进行经济生产、处理与外国的关系和保卫国家——却是中央苏联当局的责任。在与国家权力有关的象征性标志与表现形式如国旗、国徽、国歌、宪法、护照、纪念仪式、效忠宣誓等中, 存在着相似的等级体系: 首要的焦点, 与国籍地位相关的, 是苏联层次的; 与加盟共和国相称的, 则是次要的、国内的, 一般来说, 即使是在民族地域单位的命名民族 (titular people) 中也了解甚少。

苏联意识的明确特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有一段时间是斯大林主义) 意识形态, 它通过

²¹ 关于苏联的语言规划政策, 参看 Kirkwood (1989)。

²² 参看, 如, 1963, *Kyrgyzstandyn Tarykhy: Istorija Kirgizii* (吉尔吉斯斯坦史), 第 2 卷 (第 1 卷主编 M. P. Vjatkin; 第 2 卷主编 K. K. Karakejev), 伏龙芝: AN KirSSR; M. O. Auevov et al (eds), 1957-59, *Kazakhstan tarikhy: Istorija Kazakhskoj SSR* (哈萨克 SSR 史), Alma Ata: AN KazSSR。值得注意的是, 同样的关于塔吉克人历史的著作, 没有用“塔吉克斯坦史 (History of Tadjikistan)”的标题, 而是“塔吉克人们的历史 (History of the Tadjik people)” (最先的研究是 B. G. Gafurov 所做的, *Istorija Tszhikskogo Naroda*, 1949, n.p.,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 随后扩展开来, 用同一题目再版, 加入了其它的学术内容), 从而暗示着指称的“民族区域”和与地域同名的“民族”的历史之间的不一致。

公共传播和公共信仰的所有可能的渠道进行宣传，教育过程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儿童，未来的公民们，是在学校中最初学习认同于意识形态系统，并因国家在社会、经济和技术上的进步而感到自豪；这种课程在学院教育的每一阶段都会重申并得到进一步阐释。乐观主义的态度和“党、政府、人民的必然胜利和‘与历史同步的’思想体系”被反复灌输（Geiger 1970：128-9）。在苏联制度下社会的正义和安全，比以前有了很大程度提高的一般认识，加强了这些想法；基于功绩、而非基于出身的个人成功的机会，也确实比以前增加了。

另外三个因素也促进了苏联意识的增强：第一个是对于“国家敌人”的恐惧。从一开始，外部势力的入侵就被用作确保人们忍受建设社会主义艰苦斗争的政治策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外国入侵的威胁成为现实时，并肩作战、保卫苏联的经历，是苏联意识的无可比拟的重要结晶，为了生存的共同战斗将原本不同的民族群体结合成了一个单一的实体。第二个加速了对国家的认同过程的因素，是政府对信息来源的垄断。官方的解释和理论很少受到其他文本的挑战，所以它们在广大群众中获得了绝对真理性与权威性的影响。中亚的情况尤其如此，字母表的改变意味着即使年轻一代的人们能够成功地获得苏联之前的记录（这本身就是极不可能的），他们也不能阅读了。第三个因素是在苏联境内旅行比较容易，这给予“公共领域（space）”的概念以物质基础，也促进了不同民族群体成员之间的接触。中亚人以他们长期以来的低水平地理流动而著名，但在短时期内——为了上学、工作、服役或者单纯的旅游——他们在苏联境内的游历也相当广泛。这是他们的家，一个语言、建筑、货币、行政手续、歌曲以及玩笑都相似的地方；相比之下，外面的世界就是“海外”，外国的、不友好的地区。

与建设一个新社会和培养一种新的意识的结构性努力同步，协调一致的努力也用于捣毁过去的文化遗产，主要的目标是伊斯兰教——苏联之前时代的界定体系。最初是试图通过把伊斯兰教权威的支持者禁闭起来的方式，来赢得当地人的信任。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采用了更为高压的政策：伊斯兰教的学校和法庭在1927至1928年间逐渐停止使用，“朝圣”（haj指一年一度的麦加朝圣）这时也被中止，大量的清真寺关闭，一些被毁掉了，其他改成了仓库、反宗教的博物馆或世俗的俱乐部。以前支持着宗教基础的慈善基金（waqf）被没收，并引入了区别对待的法律（如与住宅和职业相联系）以对抗穆斯林的从业者，其中的许多人在1930年代的清洗运动中被杀。阿拉伯字母——记载《古兰经》的文字——的被废除，象征了新与旧之间的分裂；从那以后，仅仅拥有一本用阿拉伯文字书写的书籍，就可以成为被惩罚的资本。与恐怖运动相伴的，是无情的反宗教、无神论宣传通过大众传媒、学校和政治活动家进行传播。

这种猛攻的后果，造成了伊斯兰教在一、二十年的时间里，几乎不再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宗教而发挥作用。在苏联之前的时代里，关于忠诚的教条原则的知识，关于“五功”（“忠诚的五个支柱”）的必须的日常仪式等，也许并不是广为流传，尤其在游牧部落中可能不是流传很广，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在伊斯兰教的框架内运行的，并把自己看作是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伊斯兰教在苏联时代遭到了破坏。一些关于生命周期的仪式保留了下来，但大部分由于其明显的宗教内容而被抛弃²³。

用来逐渐破坏传统价值观的另一个策略是妇女解放运动，这一运动是以南部定居区的妇女揭去面纱为象征的，那一地区的妇女直到今天在室外还必须完全包裹在斗篷和面纱之内。妇女解放

²³ 关于苏联伊斯兰教的描写很多，但大多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偏见，或者赞同、或者反对主流制度。最全面、可信的著作，是Saidbajev写的（1984）。在西方，Bennigsen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esp 1967，与Lemerrier-Quellejay合作）也很有影响。要做一简短的调查，最近的报告，可以参看Akiner（1996）。

运动的目的是通过挑战传统的权力、声望和权威结构，带动社会中的最根本性改变。提出了各种措施，以给予妇女以法律、教育和工作上的平等权利；通过种种努力，让妇女进入政治和行政机关。运动的后果不象预期中那么激动人心，不过最后还是以妇女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并更热心地参与到公共事物中去为结局。从长远来看，这有助于社会的现代化和苏维埃化。

在这一时期，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也遭受到了攻击。各种各样土生土长的艺术形式，如声乐和器乐作品、建筑、史诗说唱、书法、袖珍画，几乎都被毁坏了。即使是传统的娱乐形式，如摔跤、魔术、杂技等，也被有利于苏联的世界体育和马戏表演代替了。只有那些能使自己的技术为新制度服务的人才能幸免。例如，akyn（游吟诗人）开始利用传统的形式创作关于革命成就的颂歌，织毯工人用密密的绳结织出了列宁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的肖像。保持和发展中亚民间艺术的条件是有限的，而且，受到西方/俄罗斯的深刻影响，它们降低到了大杂烩的水平，缺乏激情和创造力。年轻的一代逐渐转向了新的、西方形式的苏联艺术，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最后，历史上的“过去”所呈现的那种生活方式，成为这场运动要捣毁的目标的一部分。给传统社会制造一个负面的评估的最阴险的技巧之一，就是旧与新之间在修辞学上的二元对立，它们分别以黑暗与光明、压迫与正义、邪恶与善良、无知与渊博来作为典型特征。这种近似于咒语的方法被频繁使用，从小学生的最初的阅读课到高级官员的演讲，从历史教科书到小说²⁴。对苏联之前的社会病态假设的叙述，在不加批评（也没有批评）的情况下被巩固了。例如，在传统社会中的妇女地位，被夸张地强调了她们所受的限制，而可能的利益和赔偿则被忽略或嘲笑了。同样的方法也用于与社会和文化发展有关的其他领域的研究中，不管学术层次，还是普及层次。隐含的信息就是，首先，那个土生土长的、“已经失去”了的社会不如苏联社会；其次，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进程，只能在苏联政府的帮助和引导下完成；这种灌输的目的就是培养对新制度的感恩之情，与之相伴随的愿望，是忍受今天的艰苦生活，将它作为远离过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这种灌输获得了高度的成功。

苏联意识中混合了“国际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在苏联的使用中意味着不同“民族”（即民族群体）之间的和平共处与合作，其终极意识形态目标是民族单位联合成一个单一的地球实体，

²⁴ 两个例子也许可以就足以说明这种带有感情色彩的策略的味道。第一个例子取自一本政治手册，第二个取自学校教科书：

革命前，中亚的女孩和妇女们生活在受奴役、受压迫的状态下，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权。只有在苏联的统治下，她们才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和独立，在与男人平等的基础上，享受所有幸福生活的祝福。

（摘自 Tursunoi Akhunova 于 1961 年 5 月写给土库曼妇女朋友们的公开信，引自文献集 *Dejatel'nost' Kompartii Uzbekistana po usileniju sotsial'noj aktivnosti zhenshchin*，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1986，p.61。）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塔什干，与今天的塔什干根本不一样……（那时候）城市里的许多街道都是弯弯曲曲的，路面崎岖不平，道路狭窄昏暗，夏天尘土飞扬，冬天满是泥泞……（现在）取代了原来又是土又是泥、弯曲狭窄的街道的，是铺好沥青的街道，宽阔平坦、干净笔直；还有美丽的、高高的大楼。（M.Akbarov and Iu.Eshonqulov，*Ozbek tili*，塔什干：Oqituvchi，1978：35）

在苏维埃联盟存在的古怪的（odd）的 70 年中，40 年里国家是由非俄罗斯人领导的（斯大林 1922-53，赫鲁晓夫 1953-64）。1989-90 年，哈萨克的党的第一书记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影响力如此之大，许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可信的取代戈尔巴乔夫地位的候选人。其他的非俄罗斯人中，也有大量人员在党中央占据了很高的位置。在如大不列颠等的殖民帝国中，比如说，印度人获得这么显赫的地位，让他自己成为国家的首领，这是不可想象的。关于党的职务中的民族的调查，参见 Rywkin（1963）。

阶段性目标是保证各团体在待遇和机遇上的平等，没有哪个团体可以有超越于他人之上的特权。而在实践中，事情总不是这么公正地进行，俄罗斯在某些事情上（尤其是牵涉到国家时）当然占据着有利的地位。不过，通过党的构成和声明，把民族平等将要实现的普遍感觉推广到相当大范围内的民众中去，政府成功地为此提供了机会²⁵。在苏联时代的大部分时期，不同民族之间显然是融洽的。从单独的层面上来讲，民族歧视的例子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没有制度化的种族歧视。这有助于平衡各个共和国内部给予命名（titular）群体以特殊待遇的倾向，至少是保持这种倾向。

这也促进了对大量移民的吸纳。在整个苏联时期，不断地有移民进入中亚各加盟共和国，一些是自愿来的，其他则是强迫下的政治流放。前者主要是斯拉夫人，后者主要由“被惩罚的人们”组成，如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Meskhetian土耳其人、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人和朝鲜人，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中被从苏维埃联盟的其他地方整体驱逐到此，原因是被指控与敌军勾结（这些控告大约于20年后取消；然而到那时，被驱逐者原来的居住地已经被别人接管，他们极难回家，所以很多人被搁浅在了流放地）²⁶。到1979年底，中亚大约有100个民族存在，其中许多是相当近的新到来者。每个加盟共和国中的民族平衡在很大程度上被改变了，例如，在土库曼斯坦，以之命名的民族（titular people）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926年的73.8%下降到1970年的65.6%；同一时期，哈萨克斯坦的比例则从57.1%下降到了32.6%。城市地区的不平衡更为显著：1970年，哈萨克人只占哈萨克斯坦城市人口的17.1%。

这些其他地区的移民群体保留着他们自己独立的民族意识，有的采纳了一些当地的习惯（如准备食物，或者应付气候的方法），但他们或者仅仅学了一点命名民族（titular people）语言的皮毛知识，或者只是对当地的传统感兴趣。他们后来（独立之后）因此而受到了惩罚，但实际上，他们应该向当地文化同化并不是苏联规范的一部分，一体化的力量是国家意识：只有在这样的框架内，民族多样性的“沙拉碗”才被看作是一笔绝对财富。

外来者和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一样顽强地维持着不同族群之间的界限，表面上相互渗透，但是除了在党内和职业组织中的民族之间的高层接触外，不同族群之间的非正式互动很少。而且，部分是出于选择，部分是由于环境压力，在职业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民族分层。中亚人大多倾向于从事服务工业、艺术、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学科）、教学和护理专业、农业等领域；俄罗斯人主要从事工业、技术职业以及某些行政领域。同样，在住宅上，尽管有许多民族混合街区，很多中亚人还是倾向于生活在单一民族地区，一般是在城市或城镇的老街区²⁷。中亚人同样倾向于与外来者保持社会距离，异族通婚很少见，尤其是中亚女孩与其他族群的男人之间的通婚。这种排他性用来在个人和家庭的范围内保持文化的连续性。这同样鼓励了定型和贴标签（例如，X族群是放荡的和粗鲁的，我们是有纪律、有文化的），从而有助于保持疏离感²⁸。中亚人的母语维护意识非常强烈，大部分族群宣称讲母语的比例（1979年的统计数字）在97%以上。传统生命周

²⁵ 对这一主题第一个进行大型研究的，是Nekrich（1978）。

²⁶ 尽管苏联时期在职业和住宅中的民族分层的特殊例子是新的，在中亚的一般现象却是传统的，正如在本文的前面一些章节中所讨论的那样。

²⁷ Karklins（1986）对于苏维埃联盟内民族关系的正式与非正式方面进行了一项有趣的研究，引用了一些中亚的例子。一种典型的乐观的苏联观点，参见Sherstobitov（1979：184-300）。

²⁸ 中亚人保持自己母语的程度在苏维埃联盟中是最高的。但人口普查中记录下来的统计数字，并不总是可靠的。一旦涉及到语言，所反映的有时候是一个人的民族忠诚而非语言能力。在1970年代末，许多城市哈萨克人（一些资料宣称高达40%）只有极少的、甚至没有关于哈萨克语的知识。但1979年的人口普查显示，97.5%的哈萨克人口声称哈萨克语是他们的母语。这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定义和理解“母语”的准确含义是什么？特别是，这个词是否反映着共能范围和影响（fluency）的程度？

期仪式的保留程度也很高，一般是起源于伊斯兰教，但在苏联时期被不断解释为民族（不是特属于宗教）遗产的一部分，他们成为民族意识的强有力的标记。食品是民族界定的另一个重要元素，有些鱼类，如哈萨克人的bes parmak，成为了一个民族的象征。服装也是意识的一个标记，尽管它受到社会因素的控制。传统的长袍大都被一般化的欧洲/苏联服装所代替，但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项目在一些地区还保留着（如南部部分地区的男式便帽）。民族的无形属性，如礼仪法典、性别和代际关系，同样是族群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亚，除了正式的民族意识的属性和界定特征外，还有在私人领域中运作、并被民族分割加强了界限。

如上所述，苏联民族意识是被有意识地朝与预想的思想模型相一致的方向规划发展的，然而，如果这些设想在本质上与以前的自我意识不相容的话，它们极有可能不被接受。实际上，一致性的程度很值得争议。在绝大多数情形中，新的民族联合了一些小的群组，这些小的群组以前是根据地理区域或者氏族/部落血统而被界定（并自我界定）的，但是他们在文化、语言和历史上显示出了某些共同特征。新的区域边界有时割裂了以前属于一个行政实体的土地（例如，对khanates的割裂），但是群体的成员们共享一种集体意识，并通过共同的方言加强了这种集体意识，他们不愿意被分配到不同的民族中（除了有争议的例外，Sarts）。因此，尽管相对于以前基于对个人统治或朝代的忠诚的分类原则来说，基于广义界定的人种——语言特征的民族群体分类的基本原理是新的，但却没有违反传统的民族意识的意思。而且，因为这些小的群组在很大程度上是完好地结合进了更大的民族群体，即使在新的民族意识内在化之后，以前把他们分开的旧边界仍然在亚民族的层次上发挥着作用。这种非正式的意识比正式的意识具有更多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并不能根据事态的需要或者潜伏下来，或者被触发和操纵。

这种非正式意识是通过多种途径来维持的。首先，关于家庭宗系的知识在传统上具有极大重要性，几乎所有的男人和大多数的女人知道自己自己上溯几代的血统。考虑到极低的地理迁移率和相对较小的民族人口规模（如1959年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分别在一百万左右），确定扩大的家族群体的大多数成员是可能的。其次，生命仪式（尤其是割礼、婚礼和葬礼）总是在把即使关系很远的亲戚也集中起来的大家庭集会上进行庆祝的；在这种集会上，未来的婚姻被公开地计划着，因而使关系网络更为长久。第三，人们有很强烈的对于家族关系的责任和义务感，这导致了“给予”和“获得”帮助的不断循环，把群体中的成员结合在一起。第四，不管个人是否属于同一家族群体的一部分，对起源地的地域忠诚都把他们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也带给他们相互支持的义务。通过这样的联结，维护了民族联系的紧密的基础，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力量，为政治组织、职业和商业组织中的小集团、偶尔也为有组织的罪犯网络（即所谓的“黑手党”），提供了基础。

概括一下苏联后期的形势，存在着三个主要层次的意识：国家公民意识（苏联）；民族群体意识（nationality），这种意识有时候与同名的地域组织联系在一起（如乌兹别克人和回纥人，前者有一个同名的地域，而后者没有）；亚民族忠诚意识（如家族群体、地域网络）²⁹。这些层次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它们好象被置于一种自由悬浮的状态中，每种意识在等级中的重要性，是在既定时刻根据当时的形势来确定的。国家意识是通过正式的制度和标志来加强的，亚民族意识则是通过非正式途径来维持的。民族意识从这两个层次同时得到支撑：作为国家的一个组成单位和作为它所包含的亚民族的复合体，民族得到其合法性的来源。

²⁹ 关于哈萨克的民族复兴，在Akiner的著作中有更详细的论述（1995a，esp：51-9）。

民族复兴

到 1960 年代，二元化的苏联——民族意识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了。苏联对于历史的解释，以及苏联的艺术、社会价值观和志向成为规范。也就在这时，与其说是作为一种抗议——至少不是一种有意识的抗议——还不如说是一种对他们来源的好奇心，中亚开始出现了自发的民族复兴。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几乎同时也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在美国尤其明显）。然而在中亚，由于苏联体系的特点——对未被权威认可行为的强硬控制和不容忍，民族复兴运动很无力，也只是停留在尝试阶段。

在 1930 年代的定居化（sedentarization）和集体化运动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和文化压迫的哈萨克人中，民族复兴运动首先显现出来。寻找根源和“民族真实性”的一个表征，就是毡房（yurt，蜂窝形状的毡帐篷）的重新出现，它在过去曾是哈萨克家庭公共生活的焦点，“烟洞之轮”（wheel）被认为是神圣的东西，当盟誓的时候，有关的人要抬头看着它，将它作为诚意的一个象征。父亲毡房上的“轮”（wheel）将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传家宝，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在现代化和苏联化的过程中，毡房过了时，与之相联系的信仰、活动和行为代码的复合体也被破坏了。然而到了 1960 年代末，对于毡房重新有了需求，与其说是为了居住（尽管它仍然可以当此用途，需求的上升却绝不是出于这个原因），不如说是作为一个个民族意识的标记。在后院，家庭传统的住宅旁边，立一顶毡房成为一种时尚。到 1970 年代，毡房的使用已经从个人领域扩展到了公共领域，获得了作为宴会和其他正式场合设施的礼仪地位。

在整个中亚地区，不仅是在哈萨克斯坦，在其他的加盟共和国中，传统的手工艺品和图案也被重新发现出来。国家起初为了旅游和出口而委托复制传统手工艺品，但是它们很快在当地群众中流行起来，群众把它们看作是自己文化传统的标志。与此同时，对于传统音乐和大型口头叙事史诗的兴趣也得到了复苏，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关于方言、当地风俗和地域意识的其他方面的研究。伊斯兰教复苏的早期迹象也出现了，在这一阶段的规模还很小，但无论如何，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无神论宣传之后，这些迹象还是很有意义的。

在 1980 年代出现了早期的煽动民族意识政治化的迹象，最初的表征是 1986 年 12 月在哈萨克首府的学生示威运动。表面上看，示威的原因是抗议免去哈萨克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并任命一个以前从没有在哈萨克工作过的俄罗斯人，Gennadj Kolbin 来代替他。这一事件前后的形势仍然很不明朗。示威被迅速而残忍地镇压了，也没有再发生公开的异议，但这件事后来被看作是哈萨克民族运动的象征性起点。在乌兹别克斯坦，“民族觉醒”（当时是这样称呼的）的推动力，来源于中央当局围绕棉花生产中的贪污情况所做的调查。调查显示，莫斯科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几个高级官员与一个大骗局有牵连，但做了整个事件替罪羊的却是乌兹别克斯坦人，许多无辜百姓因控伪造罪而被捕。这在乌兹别克斯坦引起了愤慨和强烈的不满，民族团结的意识增大了，并必然地产生了与“中央”的政治距离（distance），如果这种感情不是疏远的话。回想起来（虽然在当时不是很清楚），这是朝着乌兹别克民族主义迈出的第一步。

民族意识（consciousness）出现的另一个迹象，是第一次独立的、非国家社会——政治性的运动的形成，大约是在 1989 年。大部分群体在定位上喊着“国（族）际的”（在苏联意义上），但在别人看来，却涂着一层民族主义的色彩；而且，除了哈萨克斯坦的一些群体外，他们几乎全部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但这些群体并没有提出放宽民族权力或多一些区域自治权等的要求，他

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阻止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发生的民族文化和自然环境不断退化趋势的需要。在命名民族 (titular people) 语言的地位问题上,他们成功地动员了公众意见,其结果,在全部五个加盟共和国中,命名 (titular) 语言正式成为国家语言。关于俄语的地位有各种各样的陈述(如,“民族之间交流的语言”),尽管在公共事物中仍然使用俄语,它已经处于次于命名民族 (titular people) 语言的地位了。

对于民族权力的更为好战的一种宣称,在这一时期(1989-91)中亚各地爆发的武装冲突中得到了证明。两个最为激烈的事件,一个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 Meskhetian 土耳其人和当地人之间发生的,一个发生在吉尔吉斯南部的奥什,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之间,都导致了数百人的死亡。冲突的直接诱因各不相同,但根本原因却是相似的,即在工作、住宅和土地上的竞争。这一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民族对抗(杜尚别的亚美尼亚人和塔吉克人,阿什哈巴德的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和土库曼人),规模小一些,但恶性程度不低。这些事件是一种新的现象,使得当地人觉得非常奇怪,因为这与他们互相之间共同体 (inter-communal) 关系正常的友好意向背道而驰。这些冲突出人意料,另人不安地提醒着人们潜在的民族压迫。

“大蒸锅”？独立的挑战

1991 年底,作为苏联国家意想不到的突然解体的后果之一,中亚的共和国们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没有经过解放斗争,因而也没有为独立做好机构和心理准备³⁰。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开始浮出水面的民族复兴运动,仅仅做到了聚集能量,到 1991 年的时候还远不能形成一种政治势力。新国家立即面临着大量的社会、人口、经济和环境问题,然而威胁该地区稳定的最危急问题,是联盟解体后的意识形态真空。人们一下子被剥夺了整个意识的线索:与苏联系统有关的信仰、理想、志向,都无法再相信,与之相连的各种标志也失去了意义。更有甚者,当代民族意识的有效性,与民族地域性单位的边界——民族分裂的人工制品——一样,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这种突然的变迁也许会导致该地区急剧而混乱的小国林立、纷争割据的“巴尔干化”的局面。实际上,这种情况只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那就是塔吉克斯坦——苏联领土上最人工意志化的、缺陷最多的产品。其它地区之所以没有重复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以下两个要素的结合:一是名义土著民 (titular people) 的实力和民族意识的内聚力,在变迁的紧要关头,当其他因素都陷入混乱,无法确信时,它们保证了相对稳定;另外一个是在职的统治精英们的坚定领导。远离莫斯科之后,通过建立起当地的权力基础,并把自己“嫡系”(clan)的支持者安排进关键部门,他们迅速地巩固了自己作为独立领导人的地位。他们成功地将自己重新塑造为民族英雄,可以与甘地、真纳、恩克鲁玛等人物在境界和成就上相媲美的新国家的“国父”(founding father)。这样他们就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新的民族忠诚的凝聚点。精英们推出了一种仁慈的家长式统治——来源于与亲密的、熟悉的家庭语境相联系的传统的秩序和权威概念,并将之扩展——的构思,制造出局势已在控制之中、变迁过程正在受到控制和引导等的印象,从而成功地保持了公众的信心。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这使得这些国家引入改革的工作比前苏联的其他地区稍微容易一些。

后苏联时代的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塑造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

³⁰ 其中包括了乌兹别克斯坦的 350 名朝圣者,塔吉克斯坦的 100 名,吉尔吉斯斯坦的 50 名,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各大约 15 名(1996 年 8 月从塔什干的Haji Abdulkhokim Matqulov处得到的私人信息,他是 1990 年麦加朝圣的组织者和朝圣群体的领导人)。

义。新的意识形态主要取材于命名民族 (titular people) 的文化和传统。朝向民族统治的转变,证明了语言上的这样一种迅速的转换是正当的,即为什么苏联对于“民族/民族的”界定——与民族群体有关的——,会被一种更广泛接受的界定——“民族/民族的”是与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有关的——所代替。因而,在苏联统治下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民族(籍别)”和“公民身份”,在命名土著民 (titular people) 的民族化的指称下,合并成了一体(如,一个吉尔吉斯公民,不管他/她的民族来源如何,都是一个“吉尔吉斯公民”或“吉尔吉斯斯坦人”)。正如上面所说的,1924年的民族界定在区分名义上的族群 (titular group) 和领土单位时,本质上是摸棱两可的:自然边界是按族群的居住区域来规定的,但这些区域并不是为单一民族共和国而划分的,一开始就是为了“族际的”(international)的共和国。这样,在区域和名义民族 (titular people) 之间就有一个特殊的象征性确认的联结,然而在该区域内,这个族群只不过是众多族群中的一个。这种情况现在改变了:名义民族 (titular people) 在用他们名字命名的国家中构成了第一民族,并要为那些选择在“他们”的领土上“象客人一样”生活的其他族群制定规范。

国家“民族化”的一个方面,表现在承认命名民族 (titular people) 各自语言的国语地位的法律的执行。这些法律在苏联时代末期 (1989-90) 通过,但在那时更多地是被视为民族声望的象征性标记,而非仅仅是一个实践目标。独立之后,五个国家都制定了适当的程序,要求在十或十五年内公共场合完全使用国语。同时,国语越来越多地用于大众媒体,俄语的使用率稳定地减少。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许多人以前只有非常有限的国语知识(即使在理论上这是他们的母语),现在也经常在他们的公开演讲中使用国语。工作场所中的使用也很广泛。四个国家(塔吉克斯坦除外)已经做出决定,重新使用拉丁字母 (script) (1930 年代使用的),这暗示着与苏联时代的过去的更深的分裂。

民族文化的影响逐渐增长的另一个标志是街道和城镇的重新命名。俄国/苏联时代的名字越来越多地被与名义土著民 (titular people) 的历史和文化有关的名称所替代。例如,在哈萨克斯坦, Tselinograd (切利诺格勒) 更名为“ Akmola”; 吉尔吉斯的“伏龙芝”变成了“比什凯克”; 土库曼斯坦的“克拉斯诺伏斯克”现在是“Turkmenbashi”。为了反映当地的发音,拼写也有了改变(如在哈萨克斯坦,“Chimkent”换成了“Shymkent”)。新国家的象征同样取材于民族传统。如哈萨克国家的标志,结合进了毡房烟孔 (smoke-hole) “轮”(wheel) 的表现物 (representation), 而土库曼的旗帜则带有一部分传统地毯图案的表现物 (representation)。一些标志性的暗示来源于遥远的过去。在土库曼斯坦,帕提亚人的传承受到强调,一些民族表征(如古希腊的角状环 rhytons) 都取材于这一时期。在塔吉克斯坦,索罗亚斯德教传统有一些凸显。在整个中亚地区,传统仪式得到了复兴或被“发现”。例如,在哈萨克斯坦, aitys (吟诗比赛) 和 kurultai (公众为庆祝文化事件和与团体有关的问题的思考而集会) 激增,在这些场合,参加者经常穿上绣满花的民族长袍,享用传统食品。在更大的范围上,民族英雄的整周年纪念或者民族的独特成就也被慷慨地庆祝着。例如,1995 年吉尔吉斯斯坦民族史诗 Manas 的前年庆典活动,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 1996 年,乌兹别克斯坦组织了一系列的重大活动,庆祝帖木儿的 660 年诞辰。

对于重写历史、纠正苏联/俄罗斯统治时期偏见的需要,存在着许多争论。到目前为止,努力的方向主要是填充苏联历史留下的“空白点”,这涉及到在 1930 年代的清洗和集体化运动中遭受的损失等问题。也有一些为在苏联时期被忽视或辱骂的历史人物恢复名誉的努力。例如帖木儿,以前被描述为一个嗜血的暴君,几乎不可能对他的统治进行任何严肃的研究;现在,情况反过来了,他被看作是一个伟大英明的统治者的集中体现,有无数的项目投入到对他统治的研究中去。

然而，却几乎没有人开始对苏联时代的历史假设，进行根本性重新评价。追溯现代民族群体从前历史时期到他们目前状态的完满叙述，还是合法化的一个重要资源：置疑它们就是置疑现行的政治日程。苏联民族政策的这一方面，仍然是有争议的。

中亚国家在观点上改变的另一个标记，是伊斯兰教的复苏，这开始于 1970 年代 Ferghana（费尔干纳河）流域（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塔吉克斯坦北部）小规模宗教复兴运动。稍后，政府对伊斯兰教政策的突然转变，给予了这一运动以另一个更强大的推动力。以前，伊斯兰教被宣称是一个有害的力量，不利于进步。然而到 1980 年代末，政府态度出现了缓和的迹象，部分是因为整个苏维埃联盟内部对宗教的容忍能力大了一些，但同时也是试图通过培养对土生土长的伊斯兰教传统的自豪感，来对抗可以被感知的伊朗影响的威胁。在 1989 年开放的清真寺比以前十年中开放的总数都多，公众对于伊斯兰教节日的庆祝也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古兰经》的复本和朗诵《古兰经》的录音和磁带，也突然地出现在了国家经营的书报摊上。允许进行 haj（麦加朝圣）的苏联穆斯林的人数，从 1989 年的 15 人上升到 1990 年的 1400 人，而且总体来看，他们与其他国家的穆斯林的联系增加了³¹。这些措施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宗教回归，但是把伊斯兰教引入了公众领域。伊斯兰教的符号和引文（references）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穆斯林的教士重新受到尊重，并被邀请对“改革”（perestroika）的进程作贡献。

独立后，社会环境的重新伊斯兰化，被用作没有发生的解放斗争的替代品。作为苏联解体后发生的直接后果，在建造清真寺的狂潮中，有一股必胜主义热情。在土库曼斯坦，在 1980 年代仅有 4 座清真寺用于礼拜，到 1994 年就有了 181 座，尚有 100 座或更多在筹划之中。在乌兹别克斯坦，1989 年有 300 座清真寺，但 1993 年的数目就超过了 5,000³²。其他共和国的也有相似清真寺激增的情况。学校和志愿团体开始教阿拉伯字母（script）（中亚于 1930 年废除），并指导阅读《古兰经》。整个地区都开办了穆斯林大学（Madrasah，阿语，马德拉沙，意为学校）和伊斯兰文化中心。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发展变化是中亚国家的总统们鼓励、甚至是发动的结果，尤其是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他们想把提高伊斯兰教的价值，作为填充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被相信后留下的信仰真空的一条途径。但同时，他们也害怕伊斯兰教的复苏会形成一种力量，并最终对他们的统治构成威胁。因此，国家当局小心地控制和监督着所有的宗教活动。

今天，尽管大多数的中亚人欢迎伊斯兰教重回公共空间，但多数人并不希望它承担管理功能，他们仍然强烈地认为宗教与国家权力应该相互独立。即使如此，一个积极负责的信奉者的核心已经开始出现，他们中的相当大部分来自于农村和乡间小镇，或者首都城市的贫民区，但大学生和青年专业人员也有一个固定的数目。独立的、所谓“原教旨”倾向的非正式群体也开始出现，这些群体大多看起来很小，主要基于当地。唯一一个看起来基础比较坚实的团体是伊斯兰教复兴党（Islamic Revival Party），尽管它也并未得到大范围的支持³³。一些人——包括中亚人和外国人——认为，这些群体的出现和其他形式的宗教活动的增加，是极端形式的大规模回归伊斯兰教的前

³¹ Azija, 1994 年 7 月 11 日, p.24; Nezavisimaja gazeta, 1994 年 1 月 6 日, p.3; 同样是从该地区的穆斯林团体成员处得到的私人信息。

³² 伊斯兰教复兴党（Islamic Revival Party）于 1990 年在阿斯特拉罕（Astrakhan）成立，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都有分支机构，虽然在这些国家是被官方禁止的。Akiner（1995b, pp.51-4）讨论了伊斯兰教在中亚的政治化和未来的前景。

³³ 在 1994 年，超过 40 万的人从哈萨克斯坦移走，大概是 1993 年的两倍。其中包括 25 万俄罗斯人、大约 9 万德国人（德国人口的数量几乎下降到了 1989 年的一半，那时的数字是 95.8 万），3 万多乌克兰人和大约 1 千鞑靼人（Kazakhstanskaja pravda, 1995 年 7 月 8 日）。Kadyrzhano (1995: 28-35) 参考俄罗斯的人口情况，分析了移民过程的部分原因。

奏。然而其他人把它看作是一个再调整的过程，是对数十年强迫世俗化的反作用，它将很快地稳定下来，到那时伊斯兰教将已经在团体生活中占据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却非支配性的地位。要确定这两种预言哪种可能更正确，还为时过早。现在唯一清楚的是，至少在很近的将来，在五个国家中，政府将在对伊斯兰教的阶段控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些变化和其他相似的变化制造了当地人和移民群体之间的隔阂，后者感到他们自己遭到了不公平的损失。过去，移入者（除了最初的那些被放逐的人口外）与名义土著民（titular people）享有同样的权利，存在着一种平等的观念，或者至少是容易控制的反对裙带关系的不平等。在苏维埃体系的语境中，在“族际主义”的精神下，他们来到（或是被送到）中亚。然而独立之后，他们却突然发现自己被放逐到一个越来越不相容、甚至是敌意的环境中去。国语法是引起特别关注的一个原因：许多人认为他们将会用做在公共生活中歧视非命名民族（non-titular people）的一种方法。由于害怕他们在此地没有未来，成千上万的人选择了移民，大多数是斯拉夫人和德国人（大部分回到了德国）；但是其他的族群，包括那些有穆斯林血统的（如鞑靼人）也准备离开³⁴。大量的移民是高级的专业人员和熟练的技术员，这一部分劳动力的突然流失，破坏了为新生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付出的努力。新国家的政府试图通过向移民提供至少是在合同期间（agreed period）内的财政和职业鼓励，来堵住这一流动。而最根本的问题，政治、社会、文化上的边缘化，仍然存在着³⁵。尽管法律上没有对移民的歧视，一些人还是觉得自己被当作二等公民来对待。有俄罗斯血统的人要求允许双重国籍，土库曼斯坦已经允许了，但其它国家对这一建议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反对。无论如何，知道了俄罗斯政府已经承担起关注（watching brief）他们安康的工作，还是会让人多少舒服一点的。一些小民族的族群，没有可以要求帮助的强有力的保护者，也没有可以回归的祖国。尽管这加重了他们的焦虑感和脆弱性，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并没有受到什么可以明确的骚扰和牺牲。

结 论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中亚的民族和宗教意识经历了重要的变迁和改变，从主要是地方意识、苏联时代对制度化的“民族”的非正式认同，到1990年代正式的民族——国家意识。在过去，这一进程主要是受外力的驱使和引导，今天，社会中土生土长的领导人成了民族意识的仲裁者。他们面对着一项格外复杂的工作。在沙皇、然后是苏联的统治下，从一种民族意识形态向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变迁，是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在一个更大的政治组织的框架下进行的。地区间的敌意和不满可以得到约束，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会受到镇压。现在，已经不存在可以干涉当地冲突的解决的超级权威。同时，被高人口增长率加剧了的经济压力，给这些国家资源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从而又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社会紧张。局势具有潜在的高度易变性。不管怎样，独立后的前五年带着显著的成功过去了（塔吉克斯坦总是例外），局势保持了稳定，经济重建也有一些进步。然而，在短期内帮助稳定局势的那些措施，却加剧了潜在的压力。

独立后建立起来的名义土著民（titular people）的民族主义，虽然是被知识界和媒体所塑造

³⁴ 在1994年3月的哈萨克议会选举中，在全部177名代表中，当选的只有49个俄罗斯人，10个乌克兰人，3个犹太人，3个德国人和6个其他族群的成员，其余的都是哈萨克人。到1994年11月，独立不到3年，4个最高的国家机关（总统、副总统、总理和第一副总理）都掌握在哈萨克人手中。

³⁵ 在1996年8月，塔吉克和俄罗斯政府为这一问题举行了会谈；关于双重国籍的协议，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达成。

和宣传出来的，还是得到了各自政府最高集团的支持，它在后苏联的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保持了名义土著民（titular peoples）们的自信心，在极为困难的时候给他们以希望和尊严。这是不小的成就。但并非没有危险。首先，它加剧了各国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制造了“一等”和“二等”公民的意识。在这样的形式下，一些微小的意外，就会突然激发潜伏的敌意（就象 1989-91 年发生的那样）。

其次，它导致了中亚各国之间民族主义者的敏感性。官员们狂热地谈论着一体化，并采取了走向更亲密合作关系的行动。然而，旧的对于土地和水源的竞争、对民族界定中领土划分不公平的不满，开始表面化了。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和贾拉勒阿巴德、塔吉克斯坦的苦盏等地，已经响起了重新划分边界的号召。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扩张主义趋势的忧虑，最早是在 1920 年代早期兴起，似乎又要重新出现了；如吉尔吉斯斯坦，已经开始寻求获得国际担保的可能性，来维护对它现有边界的确认（identity）。

另一个可能的威胁来自于总统手中权力的巩固，这是一个整个地区都发生了的过程。这样做被证实是有一些好处的，如与领导人较弱的情况相比，可以使决策更为快速，执行也更为有效。但这在将来的竞争对手中引起了不满。这种不满通过“当事人-赞助者”（client-patron）体系传递下去，鼓励了“派系”（clan）/区域性权力斗争³⁶。在塔吉克斯坦，这已经导致了对国家的瓜分。其它地区也可以发现相似的分裂倾向，虽然程度显然没有这么剧烈。然而，建立在亚地区性忠诚基础上的亚民族主义，已经在其它国家中出现，并且迟早将被政治投机分子动员起来。

要关注的一个更远的资源是伊斯兰教。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徒，所有五个国家的城市精英都开始顾虑，它也许最终会成为一种政治力量，来挑战在职的政府，削弱当前中亚社会的世俗基础。非本地人更是为伊斯兰教的复苏而不安，认为是在该地区生存的一个主要威胁。

重复这些潜在的危险，使得中亚国家的前景相当不祥。但不管怎样，当低估这些问题和形式持续的脆弱性还显得非常愚蠢时，已经有了一些另人鼓舞的发展：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慢慢地采取了信心重建措施，让非本地人确信他们的公民权和文化权利都将受到尊重；在基于“宗派”（clan）/区域基础的权力分享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努力，从而使当地的竞争无害化；国家对于伊斯兰教实践和宣传的控制仍然很强（在乌兹别克斯坦近几个月似乎是增加了），尽管允许它可以在规定的限度内发展繁荣。这些工作和其它的行动，与该地区历史上长时期相对和谐的民族关系结合在一起，使得在多数人口的志向和少数人口的需要之间建立一种可以接受的平衡，似乎是可能的。民族主义和宗教引起了强有力的情感，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只有时间可以告诉我们：未来，在这些还年轻的中亚国家中，这些情感是否可能被导向和平共处；或者它们将象在世界的许多其它地区所做的那样，带着毁灭性的力量爆发出来？

（英文参考书目从略）

³⁶ 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冲突，有时被形容为“伊斯兰反对党”与世俗（支持莫斯科的）政府之间的战争。而大多数的观察家却必须承认，这首先是各个地区性小集团及其外部支持者之间的权力斗争。情况之曲折、复杂，在这样一篇文章中是无法充分概括的。关于这一课题的最新研究，参看 Mohammad-Reza Djalili and Frederic Grare (eds) 1995 *Le Tadjikistan a l'epreuve de l'indépendance*, 日内瓦：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Hautes Etudes Internationales（最新扩展后的英文版本：塔吉克斯坦：独立的挑战，伦敦：Curzon Press，即将于 1997 年出版）。

【学术动态】

第五届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厦门召开

2000年7月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并经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与中国人类学会协商，第五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配合中国人类学会2000年“人类学与21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召开。本届研讨班将作为中国人类学会2000年大会的组成部分与该会同场举办，由来自国内人类学的主要教学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民族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博物馆、云南社会科学院等——二十多人参加。应邀出席研讨班的，还有多名海外学者，

研讨班学术指导、著名社会学与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应邀在大会上做了主题发言。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历程及个人在这一历程中展开学术研究的经历，费孝通教授指出，过去一百年中国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两次跳跃。在21世纪，人类将进一步面临信息社会和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未来人类发展需要探讨“和而不同”的文化交往规则，而人类学将在这中文化交往法则的探讨中扮演重要角色。“和而不同”的主张，不是要“文化保守”，而是说历史的发展可能比我们以往的观察要复杂得多，未来人文和社会研究工作者务必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研讨班的主题包括，(1)与21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相关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2)与全球化、民族、国家与区域网络相关的社会与文化视野；(3)21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及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与以往几届研讨班一样，第五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议题多元化，参与的学者从人类学学科建设、方法论、国内实地社区和民族调查、政策、民间文化等角度出发，对本届研讨班的主要议题“21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展开的讨论，尤其强调在新时期中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学术和现实意义。为了推动海内外学术合作、体现中国人类学会在学术交流和学科建设方面的地位，本届研讨班列入人类学会年会作为分组讨论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议讨论的议题相对比较松散，相互之间的学术针对性也表现得比较间接。然而，研讨班的学术气氛浓厚，参与会议的学者以高度的热情投入讨论，就各自关注的学术和现实问题表达的各自的看法，充分体现了“和而不同”的基本精神。

研讨班应邀参与人名单：

境外

Professor David Parkin, Oxford University

Professor Alain Le Pichon, Pontoise University,
Cergy, Paris

Professor Fred Dam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ofessor Huang Shumin, University of Iowa

Professor Chen Zhongmin, University of Ohio

Professor Nic Tapp,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ustralia

Professor Maifair Ya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Professor Frank Pieke, Oxford University

Professor Sara Friedman, Cornell University

金光亿 韩国汉城大学人类学系

港台

李亦园 台北中央研究院

乔 健 台湾花莲东华大学族群与文化研究所

王明珂 台北中央研究院

吴天泰 台湾东华大学

大陆

费孝通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潘乃谷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马 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王铭铭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麻国庆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张宏明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郝时远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

纳日碧力格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

翁乃群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

何星亮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

色 音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

王晓丽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

曾少聪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

杨圣敏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

刘铁梁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

彭兆荣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蓝达居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黄淑聘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龚佩华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周大鸣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李友梅 上海大学文学院

胡鸿保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王亚南 云南社会科学院

马 京 云南大学人类学系

徐杰舜 广西民族学院

王俊敏 内蒙古党校

叶 涛 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

钟 年 湖北大学文化研究所

孙秋云 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徐新建 四川大学中文系

靳 薇 中央党校民族教研室

中国社会学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邮编: 100871

责任编辑: 于长江
电子邮件: chjyu@sina.com